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2



中国近代爱国名人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黄遵宪

“讲着山歌吾就多，广州带回十八箩。
拿出一箩同你和，和到明年割早禾。”

这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的一首民歌。嘉应州是有名的山歌之乡。当地人民酷爱唱歌，每于赤日亭午，或圆月初升，不知什么地方突然响起了“嗨嗨！有好山歌溜呀溜出来”的长声，这就是对歌的讯号了。于是，嘹亮的歌声立刻响彻于峰峦起伏间、长林浅水处。

1848年4月27日，黄遵宪在这个山歌之乡出生。

1840年，即黄遵宪出生之前8年，为了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政府，在1842年与侵略者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出卖大量民族权益。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向中国伸展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势力，独立的封建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压迫的同时，又积极展开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黄遵宪的家乡嘉应州，是广东北部的一个山城。广东，由于地处东南，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影响最大，清政府日益暴露出来的危机和社会动荡，在这地方表现得特别剧烈。黄遵宪的少年阶段，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风狂雨骤的历史时期里。

“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深刻地暴露了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在黄遵宪由少年步入青年阶段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种亘古未有的“奇变”。

1864年，黄遵宪17岁的时候，挥笔写下了一组《感怀诗》。

由于家庭的阶级地位和自己所受的封建教养，黄遵宪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仇视的，天京失陷的消息使他喜悦异常。但是，这一运动的巨大声势，也深深地震撼了他：“惟念大乱平，正当补弊偏。”他模模糊糊地认识到，这次运动的发生，和清王朝的“弊偏”有关。怎样才能接受教训，挽救危机，中兴清王朝呢？难道能像一般世俗的儒生那样，言必称三代，拿着“车战图”和“井田谱”来挽救“时弊”吗？不能了。历史发展了，今与昔的形势不同了，不能再向遥远的古代去寻求治国、平天下之道，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说法，不合适了。他写道：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当论世事。
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在这首诗里，黄遵宪批判了昧于大势，盲目复古，尊古的世俗儒生，主张研究现实，知今阅世，睁眼看世界。这样，就把自己和那些死守祖宗成法的地方阶级顽固派区别开来。他认为，儒家只是九流中的一流，后代更分化为许多各自歧异的派别，不值得过份推崇。在这一组诗的另一首里，黄遵宪

就写道：

儒于九流中，亦只一竿揭。
矧又某氏儒，涂径各歧别。
均之筐篋物，操此何施設？
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
至德如渊濶，尚水一涧达。
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

清代地主阶级的正统学术，有所谓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指的是顾炎武、阎若璩、段玉裁、王念孙的考据训诂之学。他们继承了汉代学者的学风，注重于古书音义的考订和文字的校勘。宋学，指的是以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等人为主的唯心主义“理学”，注重于借古书以阐发地主阶级的哲学思想。它在清初继续得到封建地方阶级的大力提倡。黄遵宪认为，不管是汉学也好，宋学也好，都不足以代表囊括百家的“圣哲”——孔子的学术。

推崇孔子，这是那时地方阶级的统治思想，黄遵宪并不例外。但是，黄遵宪反对汉学、宋学，却表现了对清朝统治集团所提倡的正统学术的一种怀疑以至背离，说明在新的形势下，黄遵宪在要求建立一种为现实服务的新的学术。

1867年秋，黄遵宪去广州参加乡试未中。1870年，再次参加乡试，又名落孙山。满城风雨，叶声簌簌，“书在肩挑剑在囊，槐花空作一秋忙”，黄遵宪不无牢骚地踏上了归途。途中，经过香港，漫步街头，重温了当年丧权辱国的历史。他看到的是英国殖民者筑起的高高的战垒，到处是准备运入内地的鸦片烟，也看到了一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事物，他沉痛地写下了“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的诗句。在这以后的几年内，黄遵宪一方面鄙弃科学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参加各种科举考试，屡次应试，屡次失败，已使他对科举仕途灰心失望。

1876年，黄遵宪随父至烟台时，认识了闽县的龚易图 and 南海的张荫桓。张荫桓是个洋务派官僚，后来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和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黄遵宪在和他们诗酒联吟中，也向他们陈述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当时，因为云南人民打死了迎接英国“武装探路队”的英使馆职员马嘉理，李鸿章正与英使威妥玛在烟台会谈。黄遵宪也见过他，大约也向他发表过自己的一些见解。李鸿章曾经在别人面前称道黄遵宪为“霸才”。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关系的开始。

当时，中国军队正进入新疆，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为沙皇俄国侵占的伊犁。黄遵宪曾有荷戈从军的念头，可是，他犹豫再三，还是参加了丙子年的顺天乡试，被录取为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

随使日本

1877年1月，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被任命为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熟悉黄遵宪对时务的见解，邀他同行。黄遵宪不顾亲友们的劝阻和惋惜，毅然抛弃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璋的举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

1877年11月26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等由上海启程赴日本。12月28日，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开始了使团的各项工作。

这是中日两国自隋唐时代通好以来的中国第一个正式使团，受到日本官民以及华侨的隆重欢迎。黄遵宪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他在出使前夕，曾挥笔在自己一张半身照片上题诗，寄给友人，写道：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趂，待我扶桑濯足来。

中国古籍里称日本为扶桑，黄遵宪风趣地表示要去扶桑洗脚，正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实现抱负。

日本自 1868 年通过明治维新，实行一系列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不到 10 年，便逐渐强大起来。1874 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都迫切要求了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究竟它是怎样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黄遵宪的心情也正是这样。

黄遵宪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到日本后，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人士，通过口讲、笔谈，进行文化交流，与许多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笔谈中，黄遵宪向日本友人细致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和历史著作情况，同时，也向日本友人介绍中国文化。黄遵宪曾将一部《红楼梦》送给源辉声，并对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宜于‘左’、‘国’、‘史’、‘汉’并妙。”当源辉声谈到日本小说《源氏物语》“作意”与《红楼梦》相似时，黄遵宪遗憾地说：“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

在此之外，黄遵宪又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向日本友人访问、了解，取其杂事，分国势、天文、地理、政治等门，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成为《日本杂事诗》。夏历 7 月，由清朝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印行。“新诗脱口每争传”，1880 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商得黄遵宪的同意，曾将《日本杂事诗》的原稿埋藏于东京墨江畔的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9 字，刻石树碑，作为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一个梅花盛开的日子，源辉声设宴邀请黄遵宪等赴饮。酒酣，黄遵宪浇酒祝诗：

一卷诗兮一杯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

源辉声和诗道：

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都北部的平林寺。为了实践他“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其子大河内辉耕也将诗冢迁到了该处。

由于在日本的这些诗篇，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不曾描写过的题材和境界，所以黄遵宪自负地称之为“吟到中华以外天”。

在日本任职期间，黄遵宪非常关心西学，广泛地研究国际形势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他阅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深受启迪和震动，认为要建“太平世”，必有民主。有一次，他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如果不像日本那样维新自强，必遭奴役、瓜分之祸。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西学，积极主张仿效西方“船坚炮利”，向西方探索救国真理。黄遵宪的外交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于自己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也更激起他献身国家的热情。他对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实现民族强盛的办法非常兴趣，注重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自 1879 年

始，着手酝酿写作一部以介绍日本典章制度为主的著作《日本国志》。日本古代志书不多，汉文资料也大都残缺不全，明治维新以后的典章、礼仪又条目繁多，黄遵宪以一个中国人而从事日本史的研究，语言不达，协助乏人，困难是很多的。黄遵宪不免有时搁笔仰屋，感到难以为继。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精心采集、编纂、校勘，收集了200多种参考文献。1882年刚写出草稿，因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而中断。1885年，他从美国请假回乡，自此以后，黄遵宪便专门致力于《日本国志》的修改，至1887年夏历5月完成，前后共费时八、九年。

《日本国志》计40卷，50余万言，内容为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12类，详细具体地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改革措施及其成效。书成之日，黄遵宪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有《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中云：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人县境庐。
改制四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吾妻镜》是日本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千秋金鉴录》则是唐朝张九龄的著作。史载：8月5日为唐玄宗生日，百官纷纷上表请订该日为千秋节。至期，王公们争着献上各式各样的宝鉴，唯独张九龄却献的是历史故事10章，称为《千秋金鉴录》。“千秋鉴借吾妻镜”，黄遵宪写作《日本国志》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要借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来给清朝统治者作镜子，热切期望祖国能立刻繁荣富强起来啊！

1889年夏，清朝政府任命薛福成为出使英、法、意、比4国大臣。冬，任命袁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章京。袁昶对黄遵宪很熟悉，对《日本国志》也很肯定，认为“翔实有体”，便向薛福成推荐黄遵宪。薛福成游览了全书，不禁拍案叫绝，连声赞叹道：“奇作，奇作，真是几百年罕见的好书啊！”黄遵宪因而被任命为驻英二等参赞，再度开始了出使生活。

《日本国志》的问世，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推动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成为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读参考书。它也是戊戌变法的启蒙读物，不但维新派受到很大的启发，连光绪皇帝也曾先后两次向大臣索取这本书，从中吸取日本变法的经验。

保护华侨

1882年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3月30日，抵达美国，接任视事。不久，就碰上了美国统治集团排斥华工事件。黄遵宪在任内，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做了一些工作。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高度发展，托拉斯垄断组织开始在铁路、石油等工业部门形成，社会财富愈来愈多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集团手中，广大工人、劳动人民日趋贫困，因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伴侣的经济危机，便不断出现。一方面，工厂、企业停工倒闭，大量产品找不到销路，被迫销毁；另一方面，千百万工人处于失业饥饿状态。继1836、1847、1857、1866、18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1877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

亚州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股票下跌，工厂倒闭，商业萧条，资本家大量解雇工人，压低工资，使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起来。为了逃避危机，缓和矛盾，美国统治集团便发动了排斥华工运动。

还在 40 年代，美国资本家为了开发加利福尼亚州，曾派人到中国华南一带，以招请为名，诱骗劳动人民前往美国作工。这些人就被称为华工。在加利福尼亚以及美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开发和建设中，华工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荜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风雪交加、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如火，挥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湿泥泞、水深没膝的沼泽中，筑铁路、凿运河、开金矿，做一般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但工资却要少一半，而且还要交纳繁重的赋税。

1879 年，加利福尼亚州新宪法规定：各公司一律不许雇用中国人。自此，排斥华工事件日益频繁。旧金山华侨居住的唐人埠，成为美国种族主义分子和流氓的横行之地。他们抛砖掷石，殴辱劫掠，无所不为。1882 年，美国议院订出了《限禁华人例案》15 条，对来美、在美华工及其他中国侨民，作出了许多无礼、苛刻的限制。于是，虐待、迫害、残杀华工华侨的事层出不穷，种族主义分子愈益嚣张。一次，在黄遵宪到港口视察抵美华工船只时，居然有一名暴徒用手枪指着黄遵宪等人，说：“如收引华人入境，当以此相赠。”

对于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排华运动，黄遵宪曾向上司提出过对策，未被采用。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鼻息的清朝政府，怎么会挺起腰板来呢！这就使得黄遵宪只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一次，美国官吏煞有介事地到华人居住区“巡视”了一圈，阴阳怪气地说：“华人不讲文明，不讲卫生，违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卫生条例，应予以拘留罚款惩处。”因此，逮捕了许多华侨，满满地关在囚房里。黄遵宪闻讯便去狱中探望，并让随从度量了囚房容积，做了仔细的调查，然后把美国官员找来，指着脏肮不堪的牢房责问：“这里的卫生条件，难道比华侨居所更好吗？”黄遵宪的责问，使得美国官吏无词以对，只好释放了被关押的华侨。但是，黄遵宪的这些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华工、华侨的处境，他们仍然处于被迫害的地位。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黄遵宪个人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在《逐客篇》中，黄遵宪写道：

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
轩项五千年，到今国极弱。
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
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
茫茫六合内，何处足可托？

黄遵宪热切地同情华工、华侨的不幸遭遇，哀叹国势的衰弱，期望着祖国强大。

1891 年秋，因薛福成的举荐，黄遵宪赴新加坡任总领事。

新加坡是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黄遵宪到新加坡后，巡视各岛，探访华侨，了解情况，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一天，他在一个华侨商人的婚礼上，与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老人向黄遵宪倾吐了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和故乡的无限思念之情，最后忍不住叙述归国后被清政府罗织罪名，受到无辜欺凌和勒索的经历。说完不禁痛哭流涕。本来喜气洋洋的婚礼，变得悲悲戚戚。

后来，长时期中，清朝政府一直实行禁海政策，对于去海外的中国人，一概以“通敌”“通盗”论罪。据说，乾隆时，有一爪哇侨商归国，不久即被清朝政府逮捕，财产全部没收。1860年以后，清朝政府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订立了条约，允许华人去海外当劳工，但对于华侨归国，没有明文保护。一些归国的华侨，常常受到清朝官吏或当地土豪、恶霸的各种讹诈勒索，被指为逃犯、人口贩子，甚至被安上“接济海盗”、“要结洋匪”的罪名，于是财产被掠夺，归国后所建屋宇被拆毁……因此，许多华侨都不敢回国。黄遵宪了解这一情况后，便立即上报薛福成，要求予以解决。黄遵宪指出，华侨大都是热爱祖国的，虽然居住海外多半，但是仍然保持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国内“筹赈、筹防”了，还常常捐献巨款。经过黄遵宪的一再力争，清朝政府不得不颁布几条归侨的规定。在此之后，黄遵宪又创立“护照”制度，颁发给华侨。

实践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成了一切爱国者最响亮、最中心的口号。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爱国志士，发动“公车上书”，竭力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变法维新，改革政治。

列强接连进犯，亡国危险迫在眉睫。为拯救中华于危难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要求实行改革，以求自强。作为一个驻外使节，黄遵宪一方面亲身体会了人强我弱的不幸，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一些时代的进步思想，他深知应该变法。1895年秋，黄遵宪在上海与康有为相遇，交谈之下，甚是投机，于是积极地投入这一政治活动之中。黄遵宪与梁启超思想接近，一拍即合，在与梁的信中写道：“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梁启超也曾说：“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黄遵宪加入了上海的维新组织“强学会”。此后，黄遵宪成为维新派中一员积极分子。

1896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及其宣传刊物《中外纪闻》、《强学报》，在朝廷中顽固派的压迫下遭到封闭，黄遵宪非常气愤，决心在上海另办一种报刊，作为宣传阵地。他慷慨解囊，捐款1000元，作为开办费。邀请了20多岁的有为青年梁启超担任主笔，并赠诗梁启超，写道：

寸寸河山寸寸金，侂离分裂力谁任？

村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8月9日，一种新型刊物正式问世，每10日1册，每册20余页，分论说、谕析、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门类。这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时务报》。这一刊物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这时竟破格召见黄遵宪。10月，光绪皇帝召见黄遵宪时说：“西方政治为什么胜于中国？”黄遵宪回答说：“西方国家的强大，原因都在于变法。”还说：“在伦敦时，听老人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呢！”光绪皇帝听了开始有些惊讶，后来，笑着点头称是。接着，黄遵宪又受到光绪皇帝的教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接见。

1879年夏，由于翁同龢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和时务学堂总理等职。他抵湖南后，即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

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为维新培养人才。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不久，德国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胶州湾，黄遵宪感叹时事，写下《书愤》一诗：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
瓜公惟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
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民族危亡的加深，进一步坚定了黄遵宪变法自强的决心。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进步人士齐汇湖南，改革气氛热烈，一时成为中心。他们组织了“南学会”，讨论国家大事，拟定变法章程，会员迅速发展至千数百人。南学会每7天讲演一次，黄遵宪是南学会主会人之一，第一个到南学会讲演的就是他。在讲演中，他痛斥封建专制，主张实行变法维新，发展民族工业，希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他强调要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实现君主立宪的基础。他在南学会共作了9次演讲，因此名声大震。他还制定了一个由官民合办的保卫局制度，寓“地方自治”于其中，期望“民智自此办，民权自此伸”，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分权。在封建制度的一统天下里，黄遵宪的这些主张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黄遵宪在变法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梁启超后来说：“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光绪皇帝对黄遵宪非常赏识。1898年2月，向翁同龢索阅《日本国志》，6月，又令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

光绪皇帝幻想在改良方面得到日本的帮助，于8月11日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公使，催促他立即来京。可是，黄遵宪从这一年春天就得了痢疾，9月15日到达上海后，一直在养病，未能成行。9月28日，他读到了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扑灭了维新运动，屠杀进步人士，谭嗣同等牺牲的抄报，非常悲愤。

不久，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奏参黄遵宪，“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要求朝廷从严惩办。于是，上海道蔡钧根据朝廷的命令，扣押了黄遵宪，派兵200余人荷枪实弹围守，待命押解北上。后来，因为英国和日本等国出面干预，才使清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允许黄遵宪回乡，再不复出。从此，黄遵宪永远被逐出政治舞台。

10月15日，秋风萧瑟、月黑霜凝的夜晚，黄遵宪乘船南归。一路上，处处风波，病身憔悴。回到家中，黄遵宪痛定思痛，时常彻夜难眠。他思绪联翩，想起了这次残酷屠戮、迫害维新志士的“瓜蔓抄”，无限惆怅。悲痛之余，他写下了《感事》八首，记述了近代史上这一次著名的政变。

在家乡，黄遵宪表面上过着安闲恬静的生活，而实际上内心却是非常苦闷。他在屋里挂着当时人画的《时局图》。图上用熊、狗、蛙、鹰等象征沙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都觊觎着中国的大好河山。黄遵宪在上面题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他还人在境庐旁，建筑一座无壁楼。当时，台湾籍爱国诗人丘逢甲，也在嘉应州，与黄遵宪结为知己。丘逢甲挥笔为无壁楼赋一幅对联：

“陆沉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

上联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危亡的忧虑，下联表达他们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维新运动的愤激之情。

诗界巨子

“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

诗，虽不是黄遵宪一生活动的主要内容，但却是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他共写下了 600 多首诗，主要收集在《人境庐诗草》中，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珍贵遗产。

黄遵宪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所以，很鲜明地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1885 年，在抵御法国侵略的战斗中，年已 70 的老将冯子材勇猛顽强，身先士卒，率部打退敌军，乘胜追击，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大捷。黄遵宪闻讯，精神为之振奋，挥笔作出《冯将军歌》，热情地赞颂了为国效力的沙场老将：

何物岛夷横割地，要索黄金要岁币！

……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
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
手执蛇矛长丈八，谈笑欲吸匈奴血。
左右横排断后刀，有进无退退则杀。

……

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

黄遵宪对于献身国家的英雄将领热情歌颂，对于那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懦夫国贼则痛加鞭挞讽刺。在 1894 年爆发的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一些将领初则骄矜狂妄，继则临敌脱逃，黄遵宪又作《度辽将军歌》予以揭露：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
此行领取万户候，岂谓区区不余界。
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奈人豪。

……

彼彼三战三百余，试我七纵七擒计。

……

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
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象吴大澂这样一种狂妄自大而又满脑子功名利禄观念的昏庸统帅，怎么能战胜侵略者呢？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这样腐朽愚昧。在这首诗里，黄遵宪已经不只是愤怒，而是通过喜剧的形式，给吴大澂之流以尖锐的嘲弄、批判。

他写的许多反映民族深重灾难的诗，系统地记述了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和清政府、清军将领在帝国主义面前妥协投降的丑态，抒发了对顽固派阻挠和镇压维新运动的愤懑。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等，都是著名的诗篇。回乡之后，他模仿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也写了杂诗 89 首。题名也为《己亥杂诗》，诗集杂叙了家居生活，嘉应州风习及个人

历史。在艺术上，他的诗长于铺叙，长于刻画人物，运用和吸收散文的特点，有一定的感人力量。所以，被人们称之为“诗史”。

他的诗，除了写对祖国、故乡的怀念和时事的感叹之外，还写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和新事物。如《今别离》4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像片和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事实。此外还有《登巴黎铁塔寺》等，写法虽仿效唐古诗，内容意境则是新颖别致。这些诗在被禁锢于封建社会的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令人耳目一新。

在近代“诗界革命”，即诗歌改良运动中，黄遵宪是一个赫赫巨子。他反对封建正统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认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反对尊古贱今，主张诗歌要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现实。他努力开拓中国古典诗歌的新领域、新境界，力求在旧体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思想。他所尝试创作的新诗体，比较通俗，接近口语。如：晚年写的《军歌》24首、《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首、《幼稚园上学歌》等，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诗运动，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1905年，黄遵宪在家乡病逝，终年57岁。

黄遵宪毕生在为人和诗篇中所洋溢的爱国热情足以垂范后世。

甲午海战 群雄殉国

19世纪末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发展成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世界范围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斗争，开始侵略中国的邻国和中国的边疆。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一年是旧历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就叫做“甲午战争”。

朝鲜和中国国土相连，历来和中国关系很密切。19世纪下半期，美国和日本等国都积极侵略朝鲜，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朝鲜逐渐变成他们的商品推销市场。

在外国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朝鲜人民生活痛苦到了极点。1894年，朝鲜人民在东学党领导下，发动了起义。朝鲜政府派兵镇压，结果反被东学党打败。朝鲜政府急了，就向清政府讨救兵。

清政府派叶志超带领1500人，开赴朝鲜。日本侵略者就利用这个机会，连忙派军队侵略朝鲜。当时，在清政府里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一味退让。他请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劝阻日本，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调停上。

正当李鸿章幻想依靠别国调停避免战争的时候，日本动起手来了。7月23日，日本公使带兵到朝鲜王宫，把朝鲜国王捉了起来，派日本的走狗另外组织政府。接着，日本就不宣而战，进攻驻在朝鲜牙山的清军。

驻在牙山的清军首领叶志超，是一个腐败透顶，贪生怕死的家伙。他看到日军前来攻打牙山，就弃城逃到平壤。9月15日，日军攻打平壤，叶志超又想弃城而逃，被左宝贵将军监视起来。左宝贵率领清军英勇抗击日军，不幸中弹牺牲。当天夜里，叶志超率部冒雨仓惶逃走，渡过鸭绿江，逃回了中国国境，平壤失守。

当平壤危急时，全国人民一再呼吁清政府增兵朝鲜，抵抗日本侵略。1894年9月上旬，清政府不得不指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护送5艘轮船载运一批陆军，去朝鲜增援。9月16日，舰队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陆

军陆续登陆后，完成了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返航回旅顺。

9月17日上午，丁汝昌正在旗舰“定远”号上向各舰管带布置任务，忽然有人报告，说西南方发现有舰队驶来，丁汝昌举起望远镜眺望，果然西南方远处一团团浓烟，有支舰队迎面驶来。这是哪国的舰队呢？丁汝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后来，他隐隐约约看出，军舰的桅杆上挂的是美国国旗。到中午，两支舰队驶近了。突然，对方由12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一下子全换上了日本国旗。日本舰队鱼贯纵列，衔尾疾驶，排成阵势向北洋舰队扑来。丁汝昌立即给各舰下令，要他们马上准备战斗。

北洋舰队投入这次海战的共有10艘军舰，另加4艘鱼雷艇；日本舰队共有12艘军舰。北洋舰队共是3.5万多吨，日本舰队5万余吨；北洋舰队拥有兵力2200多人，日本舰队3500多人；北洋舰队舰艇设备较旧，航速较慢，日本舰队的舰艇设备新，航速快；此外，北洋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吨位大，各有7000多吨，日本舰队的主力舰最大的仅4000多吨。总起来看，中日双方舰队虽各有优缺点，但旗鼓相当，力量相差不大。然而北洋舰队的战备，比日本舰队的要差得多。日本早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由于控制北洋舰队的李鸿章，一再叮嘱丁汝昌不要与日本舰队开仗，北洋舰队的弹药不足，有的炮弹还和大炮口径不合，不能使用。尽管北洋舰队的条件差，广大爱国官兵斗志却十分高昂。他们接到提督发下的战斗命令后，摆开阵势，决心跟日本侵略者拚搏到底。

“定远”号是北洋舰队的旗舰，战斗一开始，就成为敌舰攻击的主要目标。不久，“定远”号已中了很多发炮弹，桅杆被打断，帅旗被打落，站在舰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也身受重伤。丁汝昌忍痛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上的官兵积极战斗。

后来丁汝昌终因负伤过重，无法指挥战斗，右翼总兵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仍带伤再战。敌舰的炮弹继续像雨点似地射向“定远”号。“定远”号中弹起火，火势越来越旺。舰上的爱国官兵毫无惧色，沉着应战。一面放炮轰击敌舰，一面浇水扑灭火焰，负伤的人仍然坚持战斗。大家同仇敌忾，奋勇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旗舰上最大一门大炮的炮手，发现炮弹只有3枚了，将士们都十分担忧。但更担忧的是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舰独自作战，被敌舰分割包围。就在这紧要时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指挥舰队作战的重任。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舰“吉野”号，邓世昌命令“济远”、“经远”两舰，向“致远”号靠拢。“经远”号靠过来了，“济远”号却远远离去。因为“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借口军舰已受重伤，放出信号弹逃走，在仓惶逃跑的行程中，竟把受了重伤的清军“杨威”号军舰给撞沉。

“致远”、“经远”两舰摆开阵势，合击敌舰。前方正遇上敌舰“西京”号，“致远”、“经远”两舰的炮手大显身手，向“西京”舰连发炮弹轰击，打折了它的舵机，“西京”号狼狈逃走。

敌舰“吉野”号为了摆脱困境，命令5艘巡洋舰疯狂反扑。黄海海面上炮声轰鸣，火光四射，硝烟弥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激战中，“经远”、“致远”两舰被迫分离。日舰集中炮火轰击“致远”号，全舰将士英勇迎敌，炮手将炮口对准“吉野”号猛烈轰击。“吉野”号几次中弹，吓得拚命逃走。邓世昌命令“致远”号紧紧追赶，一定要把它击毁。不幸“致远”号配备的弹药太少，不久炮弹打完。敌舰“吉野”号发觉“致远”号没有炮弹了，立

刻回过头来猖狂反扑。“致远”号中弹受伤，船身严重倾斜，全体官兵临危不惧，仍然沉着应战。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猖狂反扑，非常愤怒，毅然命令“致远”号开足马力。向“吉野”号撞去。甲板上的水兵听到命令，都朝着祖国跪拜，怀着满腔的仇恨，决心与敌舰“吉野”号同归于尽。

“致远”舰官兵的英勇行动，吓破了敌胆。“吉野”号上的敌人敌成一团，有的狂川，有的跳水逃跑。眼看就要撞上“吉野”号了。突然“致远”号上发生“轰隆”一声巨响，它不幸中了敌人的鱼雷，锅炉爆炸了。舰上立刻燃烧起熊熊烈火，船身缓缓下沉。全舰 250 名官兵没有一个跳水离舰，都壮烈牺牲了。

与此同时，其它战舰的爱国官兵，也在英勇奋战，狠击日舰。日舰伤亡惨重，“赫城”号、“扶桑”号均受重伤。“经远”号在管带林永升的指挥下，继续给敌舰以有力的打击，在追打受伤的敌舰时，不幸也中了鱼雷。“经远”中也开始下沉了，但官兵们仍在继续开炮轰击日舰。全舰除 19 人获救外，其余的 250 多人也都英勇殉国。

黄海战役，中日双方舰队从中午一直战到傍晚，才分头撤退。这次海战，中国方面虽然损失不少，但却没有屈服日本侵略者。中国广大爱国官兵，象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这样优秀的海军将领和许多爱国士兵，在这次海战中，充分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四句诗，是人们所熟知的为变法维新、振兴中华而献身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就义前念出的惊天动地的绝命诗。他那“横刀向天笑”的无畏气概和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人们向反动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四万万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烂漫胡同一个封建官宦家庭。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时任满清政府户部员外郎，后任湖北巡抚。

谭嗣同5岁始读四书五经，接受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文章。12岁时生母病故，庶母备极虐待，父亲冷淡，谭嗣同失去了家庭温暖，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封建纲常的种子。青少年时代，业师欧阳中鹄和“幽燕大侠”——“大刀小王五”对谭嗣同影响最深。在欧阳中鹄老先生的启蒙下，他自幼就特别崇拜明末清初的两位大爱国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他师从“大刀小王五”习剑，师徒意气相投，结成生死之交。在欧阳中鹄和“大刀小王五”的影响下，谭嗣同勤奋治学，从不沾染花天酒地的恶习，具有和一般纨绔子弟迥然不同的志趣；他对传统的儒家经典、时制文艺有反感，却常津津乐道地阅读那些被封建文人诋为异端邪说的书籍，难怪梁启超见到他时对他“竟不知有孔子”而惊讶。谭嗣同曾写诗抒怀道：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陘关。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茫！

1884年起，开始了谭嗣同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10年漫游。

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谭嗣同曾抑制着自己对八股文的憎恶而“六赴南北省试”，但终因名落孙山而不得官；也曾“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跟随迁任甘肃巩、秦、阶道道台的父亲移居祖国西北。这期间，他常观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有时带领一队慍悍的骑士，策马曳裳，驰骋于陇西高原的崇山峻岭，或在夜幕降临的旷野，点起篝火，支帐露营，奏琴高歌，纵论古今。20岁以后，他离开家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漫游生活。“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视察风土，物色豪杰”（梁启超《谭嗣同传》）。为了“视察风土，物色豪杰”，谭嗣同的足迹踏遍了数十省，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8万里，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在这“堪绕地球一周”的漫游中，是祖国山河“斗星高坡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的雄伟磅礴，“百里草原经雨绿，两行高柳束青天”的秀丽风光，激发了他对祖国、民族的深切热情；同时，旅途中他接触和了解了下层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他为祖国的灾难而叹息，为人们的痛苦而悲愤。陕甘古道上，凄厉哀号的逃荒人群，在这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脑海中打下了不可泯灭的烙印。面对此情此景，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慨叹，激起了他对满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日益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从1889年起，他开始深入研究王船山和黄宗羲的著作，接受了他们“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还浏览了当时译出的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吸收了一些“西学”知识，由此他的思想开始了由封建主义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转变。促进这个转变最后完成的决定因素，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时，谭嗣同正在湖北协助任巡抚的父亲做一些赈济灾民的工作。甲午海战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痛心疾首，夜不能寐。极度的悲愤，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摧人心肝的感事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全集》第488页）

正象他所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严酷的事实，使谭嗣同痛切地感到，战争的失败，民族的危难，根源在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只靠“船坚炮利”的洋务，不能强国富民。要救国图存，只有实行变法维新。他的理想之国，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希望清廷自动改弦易辙，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和改良。他在《三十自纪》中自号“壮飞”，表示了自己奋发努力振兴祖国、为了救中华于危亡、要做一个飞翔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壮士的志向。

冲决罗网为斗士 投身变法是中坚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谭嗣同深感“守文因旧”无补大局，必须探寻匡济时艰的新道。于是，他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且究其事理”。最后决心救亡图存，“尽变西法”。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把谭嗣同推进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行列。1895年5月，以“公车上书”为开端，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谭嗣同积极地投入了变法活动。从此，他开始写文章、发书信，痛斥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主张。在家乡浏阳，他与唐才常等人倡设了“算学社”，探索救国之道。这时，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正在京、沪两地倡办“强学会”，蜚声全国。1896年春，谭嗣同怀着敬慕求教的急切心情，北上京师，拜见发起“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者——康有为，因康有为离京而未能遂愿。但他却见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变法学说后，他“感动大喜跃”，至为佩服地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此后，他常与梁启超一起探讨维新理论，写了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讲稿。而谭嗣同的父亲却因他屡试不第而忧虑。为给儿子寻得进身之阶，就花钱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到江苏，逼迫谭嗣同去了南京。1897年初谭嗣同在候补南京知府期间，编写了他的代表作——《仁学》。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反清革命色彩，是《仁学》的突出特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谭嗣同把矛头直指“三纲五常”和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都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自由的“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他愤慨地指出：“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因此，必须“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再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冲决佛法之网罗”（《谭嗣同全集》之《仁学》篇）。还指出：“由是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全集》第55页）谭嗣同把两千年来来的历代王朝斥之为“秦政”、“大盗”，敢于直言痛斥朝廷，尖锐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则因由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全集》第56页）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网罗。在《仁学》中，谭嗣同按照“仁——通——平等”这样一个公式，从哲学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阐明了变法的合理性，驳斥了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这些内容不仅为维新派提供了理论武器，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文献之一，而且对后来的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一大批爱国志士的成长，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完成变法理论的探索之后，谭嗣同便开始投入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他应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即弃官归，安置眷属於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梁启超：《谭嗣同传》）在谭嗣同的倡议下，湖南省先后办起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不缠足会、法律学会等新式学校和组织，培养出了蔡锷等一批大有作为的革命志士。梁启超为谭嗣同作传说：“於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辟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又说，设会的目的在於“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

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事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於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而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见《谭嗣同全集》第522页）由此足见谭嗣同归湘后既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又是变法思想的主要宣传者。为了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谭嗣同又与维新志士一道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他自己担任主笔。《湘报》以笔锋犀利的文章，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理论向各阶层、各地区的人们广泛宣传，同时还出版了《湘学新报》，传播变法维新思想，一时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个省。

但是湖南方兴未艾的变法维新运动，使顽固派大为惊恐，他们以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为奥援，大肆攻击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言行为“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反动绅士王先谦等人指使地痞捣毁《湘报》馆，又勾结顽固派上奏朝廷，极力诽谤维新派，并要求禁止所有新政。黑云压城，不少维新人士纷纷离湘，连陈宝箴也开始动摇。但谭嗣同却大义凛然，他激励同志：“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亡种矣……今日但观谁勇猛耳。”（《谭嗣同全集》第303页）可见，谭嗣同无愧为冲决罗网的猛士，变法维新的中坚！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促进下，光绪皇帝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维新变法。这时，朝廷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推荐谭嗣同参与新政。6月12日，光绪帝下诏要谭嗣同迅速进京。9月5日，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4人被破格授与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称“军机四卿”。次日，谭嗣同又被光绪皇帝召见，他向光绪皇帝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光绪皇帝的信赖和变法的决心，使谭嗣同十分感动，觉得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机会来临，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完成变法大业，他悉尽全力，成为新政的主要决策者。但是谭嗣同参与新政，坚持变法，招致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刻骨仇恨。正当谭嗣同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祖国的昌盛而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时，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却挥起屠刀，向改良派猛扑过来。9月初，慈禧和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准备乘光绪帝10月到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废黜光绪皇帝，推翻新政。至9月中旬，北京城已是乌云密布。手无寸权的光绪帝只好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法筹救。”（《谭嗣同传》）在万分危机的关头，维新派因手无寸权而惊慌失措，谭嗣同自告奋勇求助于表面上赞同变法、当时统率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要他在阅兵时杀死荣禄，带兵入京，“保护圣主”，保护新政。袁世凯当即满口应允，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为防袁世凯有变，谭嗣同临走时又告诫他说：这次报皇帝的恩，救皇帝的难，立奇功大业，在于你；如果贪图富贵、向太后告密，杀了我，你可以升大官。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是决不会丧心病狂地把事情弄坏的。”袁世凯假意应承，却暗中密报荣禄。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取消一切新政，并下令搜捕改良派。“戊戌变法”中途夭折，维新志士处境险恶。康有为匆匆逃出京城，梁启超避难于外国使馆。谭嗣同虽然面临绝境，却不顾随时可能入狱

的危险，筹谋营救光绪皇帝。但事起仓猝，计划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劝梁启超东渡日本，以免罹难；朋友纷纷劝他出走，免遭横祸，连他少年时代的武术老师“大刀小王五”以性命相许保他出城，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5日，清廷提骑突然闯进了谭嗣同的住处——浏阳会馆，谭嗣同大义凛然，从容被捕。他虽身陷囹圄，却没有丝毫的悲凄和恐惧，而是镇定自若地静候那壮烈时刻的到来。他在狱壁慨然题诗道：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谭嗣同传》）

谭嗣同在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命信中写道：“这次政变，是天翻地覆的大祸，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的大祸就在眼前，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因此，我写这封血书，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做到这一点，嗣同虽生不能救国，死也愿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被捕后的第三天（1898年9月28日），年仅33岁的谭嗣同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6位爱国人士，终于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惨遭清朝反动政府杀害，慷慨就义，时人呼冤，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就义后，由谭家老管家刘凤池偷偷为他收尸埋葬。次年，他的遗骸运回湖南家乡，安葬于浏阳城外石山下（今牛石），墓前华表上镌刻着这样一幅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维新志士谭嗣同壮烈牺牲了，他的著述，后人集为《谭嗣同全集》。他为了祖国的昌盛而殉身变法的精神，至今还激励着千千万万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

昌西学 主变法——严复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处于危亡之秋，有志之士群起奔走呼号，其中有一位与康有为、梁启超齐名的思想家——严复。严复用他特有的武器——译笔，通过大量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来启发人们的思想。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被人们称为“警钟”。这口警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确曾起过震聋发聩的作用，警醒了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投身于斗争之中。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称誉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出生在一个乡村儒医的家庭。14岁时，他因父死家贫，没有走上科举仕途，而进了当时洋务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3月，又由清朝政府派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两年，学的是兵船驾驶，清政府指望他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并没有以此自限，他在当时为救亡图存而努力探讨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风气影响下，如饥似渴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中汲取营养。他利用课余时间，依次读完了亚当·斯密、

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等到1879年6月学成回国时，他又不仅是一名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也有了很深的造诣。

回国后，他先在福州的船政学堂充当教习（教师），随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这期间，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人都为这种形势焦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的呼声已响彻全国，并逐步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爱国行动。这种现实情况，也激起了严复的爱国热情。

严复的思想同康有为、梁启超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4篇政治论文：《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尖锐地抨击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治，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他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所谓的鼓民力，就是提高人民的体力，具体地说就是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智慧，主要是废除科举的八股文，提倡“西学”。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革新政治制度，因此要设立法院，废除专制政治。这4篇文章发表后，严复成了举国注目的人物。

严复和当时的维新派人物相比，还有个不同之外，就是他曾亲自到英国，接受第一流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对“西学”有直接的和相当深刻的了解。当时，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康梁等，都急于学习西方国家，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在这气氛之下，严复很自然地想到，应当把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这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于是从1895年到189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其中以《天演论》的影响最大。

赫胥黎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他的《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把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达尔文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创立“进化论”的学说，说明自然界中的生物是怎样在竞争中进化发展的。

赫胥黎认为，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也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中的现象。在人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同生物一样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在世界上，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也是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把《天演论》翻译出来以后，先在大津《国闻报》上陆续发表，1898年又正式出书，没想到，竟象口宏钟那样发出震天的巨响，震动了全国。不上几年，《天演论》便成了一般救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以天择，适者生存”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

《天演论》为什么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震动呢？

这主要是严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对外战争，一次次地失败，已使人们感到中国的前途危机重重。《天演论》正式出版的那年，又是瓜分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德俄英法日，一齐动手，抢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眼看就瓜分豆剖。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都在盘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吗？还仍可奋发图强吗？

《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的确是危险。侵

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的“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是会灭亡的，但是《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竞争，而且最后可以取胜，只要努力革新社会的政治，国家是可以复兴的，民族也能永存。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自己还加上了许多的按语，向人们大声疾呼，只要发愤努力，变法图强，中国是可以得救的；生死存亡全在于自己的努力！

赫胥黎的《天演论》，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这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社会的发展有他特有的规律，和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不一样，因此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就曾经利用这种理论，宣扬他们屠杀殖民地人民符合“优胜劣败”的规律，这更是反动。然而严复向中国人介绍这种思想，则是警告中国人民要发愤图强，如不发愤图强，就会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落得亡国灭种，因此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给中国人民敲响警钟，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促进人们的觉醒。《天演论》也因此风行海内。

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严复成了一位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还参与过一些实际行动。1896年，他曾在北京协助别人创办“通艺学堂”，用来提倡“西学”，培养维新人才。严复多次在这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使许多前来听讲的人大开眼界，提高思想认识。第2年10月，他还和朋友合作创办天津《国闻报》（每天出版）和《国文汇编》（每10天出版）。这些报刊报导国内外的形势，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思想，成了北京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可是开办一年后，因为受到顽固派的压迫而停办。就在这时，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也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遭到彻底的失败，维新派人士被杀的被杀，逃亡的逃亡。严复因为和从事实际变法的康梁联系不密切，才幸免于难，政变发生后，他并没受害，继续在北洋学堂当他的总办。

在此后的10年里，严复继续从事他的翻译工作。译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学术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术介绍到中国来。

严复的晚年，思想趋向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位先进的人物了。1921年10月27日，他因病逝世。

誓死抵抗 保卫台湾——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1895年4月17日，腐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第二款规定，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惊。各阶层人士纷纷集会演说、作文写诗、编写唱词，愤怒谴责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声讨残暴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在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都以自己的丹心碧血坚决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自发地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自发的抗日斗争中，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尤为壮烈。

台湾，美丽的宝岛，与大陆一水相隔，唇齿相依，自古就是我们伟大祖

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海峡两岸的人民同祖同宗，骨肉相连。当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民愁肠欲断肝胆俱裂。他们奔走相告，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台北人民“鸣锣罢市”，群众涌进巡抚衙门，强烈抗议腐朽政府的卖国罪行，并宣告银饷不准运出，台湾税收应全部留供抗击日本侵略军之用，并号召大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李鸿章等卖国之流“敌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以谢天地祖宗。台湾人民发出了“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人民群众自愿加入抗日民军。从南到北，抗日的武装义军遍布各地，他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准备与日军侵略者决一死战。

在台湾人民积极准备抗战的同时，清政府无视台湾人民的呼声，加紧同日本侵略者策划割台的肮脏交易，迫不及待地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使，如期交割台湾。5月下旬，日本派出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开始向台湾进犯。

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登陆以后，台湾人民不甘坐以待毙，纷纷组织义军，举起抗战大旗。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林濬冈、简成功父子领导的队伍。在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感动和鼓舞下，守卫在台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毅然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立誓死守台湾。他说：“我已年将六十，但万死不辞，惟望军民团结一致，敌忾同仇。”

5月底，悲壮激烈的台湾保卫战揭开了序幕。

激战新竹

新竹是台中的门户，位于台北与台中之间。1895年6月12日，日军近卫师团分东西两路向新竹猛扑过来。大敌当前，爱国将领徐骧聚众慷慨陈词：“……吾台，吾民父母之乡也，吾民之田庐在于是，子孙在于是，祖宗丘墓在于是。台亡，我民将安归呼？”号召“人自为战，家自为宋”，纵使“骨肉俱烬”，“是亦亡国之荣也”。说到这里，他声音嘶哑，泪如雨下。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十分感愤，有的痛哭出声，有的握拳击掌，“愿皆投身军籍，随骧以俱死”，赶跑日寇侵略者。在他的组织和鼓动下，很快组织一支民军取名为民团，一致推举徐骧为民团团团长，于是他迅速和新竹守将杨紫云并肩作战。

东路日军从山路南下时，早就埋伏在茂盛竹林的一支民军突然发起进攻，双方展开猛烈的激战，彼此正以难分难解之时，徐骧率领军民从正面呼喊着冲杀过来，经过一番苦战，全歼日军60人。两路敌军经桃仔园进攻大湖口，与民军遭遇。激战6天，日军伤亡甚众，进攻受阻，不得不撤退到中场休整。不久日军又集结大队人马卷土重来，攻势凶猛，民军因械粮不济，被迫于6月22日撤离新竹。

6月底，民军雄风再鼓，徐骧与友邻民军领袖吴汤兴、姜绍祖议定，各路军民齐头并进，夺回新竹。7月9日，民军分三路进行反攻，徐骧所率民军担任攻城先锋。但由于事先走漏消息，日军已有所备，埋伏主力于四郊，并以重兵据守城东十八尖山。战斗打响了，吴汤兴、杨紫云率军从东南进攻，

与日军激战于十八尖山。日军用大炮轰击，顿时弹飞如雨；民军则肉搏冲锋，几次从敌人手里夺得山顶。姜绍祖另率 200 精兵攻打新竹东门，遭到敌人伏兵的袭击，队伍被冲散，姜绍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徐骧按原计划率部队从北路进攻，遥见城东激战，遂领兵南驰，准备袭击敌军侧背，但这时城东的日军似洪水猛兽扑过来，民军受到两面夹击，徐骧率领民军进行英勇抗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他机智灵活，迅速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于竹林。然后又令民军分成两路，利用熟悉有利的地形，出其不意地让敌人背腹受敌，结果日军大败，被俘 100 多人，余众溃逃。此后，徐骧所部仍不断向新竹发起进攻，大小 20 余战，牵制日军达两月之久，延缓了敌人的侵占计划，台湾军民的英勇气概使敌人大为震惊。据日方记载：“台湾新竹地区，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皆他们所为。每个人，甚至妇女，都拿起武器，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一点也不怕死。”

在军民和广大群众的阻击下，日军寸步难行。8 月上旬，日军又调集大批援军进行反扑，徐骧退守大甲溪。

8 月 22 日，日军出动步、马、炮队，又向大甲溪猛扑过来。然而，山谷险阻，日军道路不熟，徐骧率伏兵拦腰截击。在战斗中，徐骧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民军战士斗志昂扬，杀声震天；日军望风丧胆，惊慌失措，纷纷落水，死亡不计其数，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甲溪是台中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虽遭失败，仍不罢休，集结主力，再度猛攻，黑旗军和民军虽有力配合，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大甲溪失陷。

保卫彰化

8 月 26 日开始，抗日武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彰化保卫战。彰化城外的八卦山，地形险要，是县城的重要屏障，台中的重镇。徐骧、吴彭年、吴汤兴等据守八卦山，居高临下，叠石为垒，分兵扼守山上险要地段，顽强阻击来犯之敌。

8 月 27 日晚，日寇水陆增援，猛扑彰化，弹雨炮霰，直逼城垣。吴汤兴率军迎战，中炮牺牲。百余战士杀入敌阵，夺回吴汤兴遗骸，大部分战士英勇战死。日寇蜂屯蚁集，来攻屏障彰化的八卦山。徐骧、吴彭年率军纵横驰骋，冲锋陷阵，骁勇异常。他们同敌人短兵相接，白刃苦战。沙场上，硝烟四起，血肉横飞。在激烈的战斗中，吴彭年受伤 10 处，仍然奋力拼杀，左右要护卫他离开阵地，他说：“我矢志与彰化共存亡，一死以报军民，葬身八卦山，无愧黑旗英名。请告刘帅，勿以我为念。”吴彭年原籍浙江余姚，任事广州。1895 年春，正当台湾存亡关头，他“见危授命，誓死不移”，毅然东渡台湾，入刘永福军幕，协助批答公文。7 月南方告急，吴彭年主动请缨赴战。援苗栗，守大甲，最后为保卫祖国而捐躯。他率领的 300 名勇士大部分壮烈的牺牲。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侵略军近卫师团伤亡 1000 多人，是侵台以来受打击最沉重的一次。

彰化失陷，徐骧率领 20 余名突围出来的战士沿着崎岖的山涧小道，向高山族同胞聚居的阿里山区进发。他们并没有气馁。胸中怒火在烧。为死去的亲友报仇，他们恨不得马上又回到那同敌人拼死厮杀的战场。但是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他们来到了高山族同胞居住的阿里山区。徐骧悲愤地告诉高山族

同胞：“日寇侵入台湾，不仅要毁灭平原上的城镇，也将毁灭深山野林，但是我们决不屈服，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们要拼死一战！”徐骧的话，像一声惊雷，唤起了高山族同胞心中炽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绝不作亡国奴！我们不是好惹的，一定要把倭寇打跑！”高山族同胞的坚决支持，使徐骧这位刚从战场上归来的民军领袖，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忘记了他曾担忧过的一切，晶莹的热泪夺眶而出。在徐骧的号召和鼓动下，高山族同胞纷纷参加民军。徐骧从中精选了700名壮士编入队伍，组成先锋营，为民军增加了新的战斗活力。

死守嘉义

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吞并台湾的目的，10月初，又调集两万多兵力，水陆两个方面夹攻台南。陆军由北白川能久中将率领近卫师团主力部队约1.5万人，从彰化外围的据点出发，直扑嘉义。

面对凶猛强大的来犯之敌，台湾军民并没有吓倒。徐骧和守将王德标采取了地雷阵战法，在敌营附近和沿途隘路布满地雷，两侧设下伏兵，然后诱敌出击。一天夜里，敌人中计，地雷爆炸，当场炸死日军700余人，伏兵又趁机拦阻溃逃之敌，打得日寇丢盔弃甲，伤亡惨重。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四面轰击嘉义城，一小时发射炮弹达180多发。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城墙被轰开，日寇象饿狼一样从东、西、北三面涌入城内。台湾军民誓死保卫嘉义城。年迈50的林澹冈率领弟子，手持双剑，挟渍水棉被挡敌弹，踊跃杀敌，视死如归。王德标、简精华等与冲入城内的敌浴血巷战，冲锋在前。徐骧手持大刀，挺立城上，怒发冲冠地大声激励战士说：“我们为台湾人民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侵略者的炮弹环绕在徐骧周围接连爆炸，震耳的轰炸声，血腥的浓烟味，令人窒息。徐骧巍然不动，顽强地坚持指挥战斗。不幸，一颗罪恶的炮弹夺走了这位杰出的爱国英雄的生命。徐骧用自己的热血，实践了他生前的豪迈誓言：“中华，中华，我所至爱！”“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愧！”战后，人们曾饱蘸血泪，写下了一幅气壮山河的挽联，来深切悼念这位为保卫台湾、保卫祖国统一而转战千里壮烈殉国的抗日先烈：

临危不惧，方显中华儿女真本色；
为国捐躯，最是人民英雄一片心！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丰功伟绩，泣天地，动鬼神。然而，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对台湾军民的抵抗不但不给以任何的军事援助，反而丧心病狂地对台湾人民实行经济封锁，严令沿海各省，不准接济孤悬海外浴血奋战的台湾人民。因此台湾军民是在军事上孤立无援，经济上缺粮少饷的情况下进行的。台湾军民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又怎能抵挡住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致使祖国的宝岛被日军霸占。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台的战斗，从1895年5月到10月，历时5个月，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历经大小百余战，抗击了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万多人。侵台的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也被击毙。

日本侵略者占领台南后，在穷搜滥捕、烧杀抢劫的枪声火光中宣布“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未屈服。12月，林大北在宜兰发动起义，提出

“驱逐倭奴，恢复中华”的战斗宗旨。此后，台湾同胞采取各种方式，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了50年，有诗为证：

骨肉分离五十秋，志士枕戈赋同仇。

头可断，血可流，不驱虎豹战不休。

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反抗侵略的优良传统。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激励每一个炎黄子孙为祖国统一，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俄罗斯美梦的破灭——梦幻

沙俄想吞并我国东北，由来已久。远的不说，1895年，中日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就曾上奏沙皇：“我们必须兼并满洲若干部分。”

沙俄自签订《中俄密约》以来，在远东的侵略重点就是中国的东北。在强租旅大地区之后，帝俄的统治集团中已经有人公开叫嚷要在“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外，再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黄俄罗斯”。沙俄远东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际主持人、财政大臣维特，推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相结合的政策，通过道胜银行输出资本，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通过经济渗透和精神奴役，企图把东北变为其垄断的势力范围。

东北义和团兴起的前夕，沙俄正在加速修筑中东铁路。沙俄在远东的政策，是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将旅顺口和大连同其本国联系起来，指望在完成这一工程后，达到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并进而控制华北。1894～1900年间，几乎所有的沙俄大臣都说，待中东铁路筑成，俄国就能够在远东自由行动，并在太平洋沿岸得到应有的地位。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只有在旅顺口牢牢地站稳脚跟，并通过铁路支线使之与俄国连接起来以后，才能在远东事务中坚定地贯彻自己的意志。”

东北义和团兴起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沙俄政府认为吞并东北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企图一举占据东北。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喧嚣：“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为第二个布哈拉”。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报刊上更是一片吞并满洲的叫嚣，有代表性的《新时报》竟公开地把我国东北地区改称为“黄俄罗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野心勃勃的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还企图在它的势力范围内用文化侵略，把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半殖民地化。文化侵略是沙俄侵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沙俄在侵略中国的进程中，曾经利用宗教掩盖其侵略，采用办学或办报宣传“俄罗斯文化”，用科学考查来盗窃情报。

沙俄侵略者在对华扩张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披着宗教的外衣。沙俄在华的东正教会是其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而传教士则是对华扩张的谋士和急先锋。10世纪中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就被人们公认为“宗教和外交”的人物。由于传教士参与了外交活动，因而在沙俄迫签的不平等条约中，教会都享有文化侵略的特权。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便利用其特权，把侵略势力伸向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俄国传教士所到之处，霸占土地，修筑教堂、欺压群众，甚至经商设厂，盘剥人民。俄国东正教曾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河北、新疆和东北各地广设教会(所)。

到 19 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东正教会的势力已侵入到铁路沿线。从旅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绥芬河和牡丹江先后修建教堂（祈祷所）130 多处。

办学校是沙俄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自 1898 年至 1917 年，沙俄在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到长春的范围内，先后开设各种男女学校 400 余所。这些学校的体制和教学内容，几乎和沙俄国内完全一样。

沙俄在中国，主要在江北出版和发行了不少报纸、杂志，作为它宣扬“俄罗斯文化”的工具。据 1909 年统计，沙俄仅在哈尔滨就出版了几十种报纸和杂志。其中发行量较大的有《远东报》。《远东报》实际上是中东铁路公司的机关报。它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华北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发行。据日本东亚同文会揭露，沙俄政府每年资助这家报纸的经费多达 17 万卢布。

沙俄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种学会，主要有：俄国皇家东方协会、中东铁路经济调查会、满洲动植物研究会等等。满洲动植物研究会的“唯一宗旨是考查满洲天然物品，随时讲演学理，考查用途，促进文明”。名为促进文明，实际上是盗窃东北各地的经济情报。中东铁路经济调查会的任务是：调查铁路沿线及北满的各种经济、商务、实业、家务。根据调查的结果，编成各种统计资料、图表和报告，作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从事经济掠夺的依据。

总之，沙俄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都是为其政治压迫、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服务的，其共同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的东北变为沙俄的“黄俄罗斯”。

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源于沙俄的“满洲问题”专家列维托夫，他主张以修筑中东铁路用地为借口，尽量扩大占地面积，推行“以俄罗斯分子在满洲进行殖民的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俄国管辖的哥萨克村镇和俄国的“士兵村”，把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化，以达到最后吞并的目的。

入侵

在东北义和团兴起之时，沙俄政府一方面增派护路军，到 1900 年 7 月上旬，中东铁路护路军从 4500 人增加到 1.1 万人。另一方面，贿赂清朝地方官员镇压义和团运动。7 月，维特指示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给东北三省将军各立一个 10 万两白银的户头，如果这些将能够控制住本省秩序，保护筑路，镇压义和团，那么这笔钱就算作是第一次付款。

7 月 13、14 日，在广州的李鸿章，两次电令东三省将军，“谨慎妥办”，“勿轻与俄军开衅”。此时，吉林将军长顺电告李鸿章和驻俄公使杨儒，负责保护铁路。署理黑龙江将军寿山也电告，已备兵防卫铁路，并且通知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要求俄国不要出兵。清朝地方政府派兵保护铁路，不仅是根据《中东铁路公司章程》，也是应沙俄的一再要求。

沙俄政府认为，借口护路，是武装占据东北的良好时机。所以，7 月 9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悍然下令，武装入侵东北。7 月 16 日宣布亲任侵华俄军的总司令，分兵五路，大举向中国东北各地发动了进攻。第一路军是奥尔洛夫少将指挥，由中东铁路西端侵入；第二路为连年刚波夫少将指挥，由海兰泡越过黑龙江，进攻瑗珲；第三路军分两支，主力由萨哈诺夫少将指挥，由

伯力乘船溯松花江侵入；另一支由契也莫夫少将指挥，由乌苏里斯克出发，越过绥芬河侵入；第四路为库列夏洛斯基少将指挥，由海参崴向琿春进犯；第五路为苏鲍齐奇中将指挥，由欧俄海运来旅顺口，向北进犯。此外，还有一路，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俄军之一部分，由天津出发，沿铁路，向山海关、锦州方向进犯。

首先进入的是由海兰泡出发的一路俄军。在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惨案后，于7月23日攻入瑗珲城，向省城齐齐哈尔进攻。义和团、鄂伦春族人民和爱国清军曾团结一致，奋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终于被俄军突破小兴安岭防线。8月27日，署理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俄军炮轰齐齐哈尔城，城中已无法防守的情况下自杀。30日，俄军入城，将库府财物抢劫一空。阿穆尔哥萨克军统领格里布斯基发布文告，宣称江东六十四屯的土地和黑龙江右岸，凡俄军占领之地，归并于俄国，由俄国政府治理。

瑗珲失守时，俄军第一路军攻占了海拉尔，清军凭大兴安岭天险，顽强扼守，连连挫败俄军，后来，在俄军后续部队增援下，清军败退，俄军沿中东铁路向东侵犯。

第三路军由伯力溯松花江，于7月30日占据三姓（依兰），8月3日在哈尔滨登陆。

以上三路是从东北入侵的俄军，到9月13日，重新建立了对中东铁路沿线的控制，然后南下，和来自旅顺口的侵略军会师。

第四路军从海参崴进犯琿春、宁古塔和吉林省会吉林城。琿春和宁古塔的守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均曾坚守。7月30日琿春失陷，8月29日宁古塔才被俄军攻占。吉林将军长顺出卖了各地守军，向俄军求降，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先，各不开枪，让道而行。”实际上是迎接俄军长驱直入。9月21日“很少几个哥萨克兵就穷凶极恶地占领了吉林城。”一切入侵俄军需用，均由吉林供应，中国军队一律缴械，银库、军械库一律归俄军看守管理，俄军将吉林银元厂抢劫一空。此后，凡吉林所在各州、县，每遇俄军，皆依照长顺的“和约”投降。

第五路俄军，在7月上旬由旅顺口向大石桥进攻，8月1日陷盖平、熊岳城，8月4日攻入营口，9月28日陷辽阳，10月1日进占沈阳。沙皇尼古拉二世10月6日给他母亲写信说：“占领沈阳对我们来说，和当时占领北京同样重要。”盛京将军增祺已在9月28日弃城逃走。副都统晋昌虽然曾一再抵抗，此时也不得不败退到库鲁（今哲里木盟库伦旗）。10月末，由天津沿铁路北犯的俄军，越过山海关，占领锦州城。至此，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均被沙俄侵略军所占据。此时，沙俄在东北的侵略军已达17.3万人。

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人民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多次制造惨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就是沙俄对中国犯罪的铁证。

海兰泡原为黑龙江左岸的一个中国村庄，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1858年沙俄迫签不平等的《瑗珲条约》将此地划给俄国后，改称布拉戈维申斯克。到1900年，该地约有3.8万人口，其中大半为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在这里耕种、作工、经商。江东六十四屯也位于黑龙江左岸，从精奇里江口以南至孙吴县的霍尔莫勒津屯一带，“纵一百四十里，横五十至七十里，地皆膏腴”，居住有3万多人口，其中多数是汉人，也有满族和达斡尔人。历史上有过六十四个中国居民屯，故称江东六十四屯。这片土地从来就是中

国人民居住的地方，即使《璦琿条约》也明确规定：该处“原住之满洲人等（即中国人），照旧准其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有清朝官员管理，俄国“不得侵犯”。这就是说，沙俄确认了中国人民在这里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该处的行政管辖权。江东六十四屯一直为璦琿副都统管辖。

1900年7月9日，沙俄政府发出侵入中国东北的命令。13日，沙俄兵船五艘沿黑龙江下驶。14日俄兵欲在璦琿强行登陆，清政府驻屯在璦琿的军队奉命阻拦，俄军首先开炮，接着便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

7月16日，沙俄军警将海兰泡的中国居民几千名，“都像关进兽栏子一样赶进了警察署”。中国居民的住宅和商店被洗劫一空。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警察署容纳不下，又被带到精奇里江畔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第二天，第一批中国居民大约3000~3500人，被沙俄哥萨克押往黑龙江边，途中掉队的都被俄兵活活砍死。当时江面最窄处仍有700英尺宽，水流湍急，哥萨克强迫中国人泅渡，先下水的立即沉溺，不敢下水的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当时对岸的中国人亲眼看到的惨景是，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鼻酸，重伤者毙岸，轻伤亡死江中，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波力拥过者80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五千余名。”从7月17日到7月21日，沙俄刽子手进行了3次同样的大屠杀。

制造海兰泡大屠杀同时，又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7月17日，沙俄军队将“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焚毙无算，其余幸免者皆逃江右”。在逃难中不少人淹死在黑龙江，来不及逃走的惨遭杀害。

沙俄侵略军制造了这两大惨案后，兵入璦琿城时，又纵火焚城，200多年的历史古城，烧成灰烬，几千名中国人被活活烧死。据记载：沙俄在海兰泡、尼布楚、司特例律、伯力、海参崴等枪杀、水淹、火烧“中国居民不下20余万”。侵入中国境内以后，自攻占璦琿起，每到一处，无不烧杀。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当时愤怒地谴责和揭露沙俄政府的暴行，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毁，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签约

1900年6月17日，正当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军，沙俄侵略军由旅顺口到大沽登陆的时刻，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外交政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根据沙俄由1896年到1899年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殊优势地位出发，决定“俄国在远东之任务全异于欧洲各国之政策”。这里所说的远东的任务，就是吞并或垄断中国东北，使之成为它的黄俄罗斯。因此，它的政策既要参加镇压义和团的侵略联军，又“不愿取得联军的指挥权”，保持“与其他欧洲军队之共同行动”，这样便可以牵制其他国家，“其他强国如不先得我们（俄国）的同意将不能采取任何的政治办法”。这可以不被中国视为敌国，最低不被视为主要敌国，以装作和清政府有“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在东北的特殊的垄断地位。这个备忘录，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赞许。在整个义和团爱国反帝斗争期间，沙俄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这个备忘录为基础的，即保持和维护清政府的存在，在

关内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进行武装侵略。在东北，单独地进行侵略活动，企图和清政府单独谈判，达成建立“黄俄罗斯”的侵略目的。

6月26日，李鸿章在广州电告维特，说清政府已召他进京，征询维特“高明的意见”。李鸿章原为签订1896年《中俄密约》的卖国贼，亲俄派，并因此而失宠。此次又被起用。俄国政府就把加速修筑中东铁路，以垄断东北的贿注压在李鸿章身上。可是，东北义和团兴起，破坏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尼古拉二世在维特的要求下，便利用了这一时机。悍然下令，武装侵入东北。但这并没有改变沙俄政府既定的外交政策。

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8月25日，沙俄政府向联军各国发出宣言，提出“善后政策”，要求各国共同一致，保留清政府，不实行瓜分政策。并且宣称：俄国政府出兵东北，是出于“一时保护”中东铁路，如果其他列强的行动不造成阻碍，待东北“恢复秩序”，俄国将从东北撤兵；“俄国驻北京公使，协同俄国军队，退返天津，俟中国政府恢复实力，与列国开始谈判时，俄国当与列国一致，委任全权委员，协商前途。”沙俄政府的这个宣言，和6月7日的备忘录是一致的。企图借以支持李鸿章，保护清政府，以便巩固和取得更多的权益，特别是加强对东北的垄断。

9月，沙俄政府急于要将武装占领东北一事取得清政府的承认，用条约加以肯定，又鉴于清政府已经西逃，所以逐渐地准备采取和东北三省的地方政权签订暂时协定，为将来的中俄单独谈判准备条件。9月18日，沙俄军舰将李鸿章接到塘沽，阿列克谢耶夫会见李鸿章时即询问：“满洲的将军们是否有权就移交占领地点进行谈判，直至缔结军事政治协定”，李氏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声称：“将军们有权同俄国人谈判，清政府会承认他们的协定。”10月，尼古拉二世、维特、拉姆斯托夫、库罗巴特金、阿列克谢耶夫等沙俄侵略分子，终于确定了和清驻守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签订暂时协定的方针。

1900年10月5日，俄军在新民厅（今辽宁省新民县）截获了弃城逃跑的增祺。阿克谢耶夫强令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为代表到旅顺口，和他的代表库斯托维支“谈判”。其实是把阿列克谢耶夫拟好的草案，强令周冕签字划押而已。1900年11月8日《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在旅顺口签订。这个暂且章程共有九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1）“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而清政府的“地方将军及地方官”对俄军必须“随时帮同”；

（2）“奉天将军将所有军队一律拆散，收缴军械”，中国军队尚存的“军装、枪炮”，“统行转交俄官经理”，俄军尚未占据的炮台、营垒、火药库“一并拆毁”；

（3）增祺“回任后，应任保卫地方安静，务使兴修铁路，毫无阻拦损害”，为此，“奉天通省城镇，应叫将军设立巡捕马步各队”；

（4）“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

（5）“营口等处，俄方暂为经理”。

1900年11月30日，增祺划押盖印。在这以前，1900年8月，吉林将军长顺开门揖盗，迎接俄军占据吉林城时，也约定清军缴械裁散，只设马步巡捕。沙俄一手炮制的这个假交还、真霸占的暂且章程，肯定对沙俄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殖民统治的既成事实。清朝在东北的地方政府成为替沙俄镇压人民，看守铁路，唯命是听的傀儡政权。沙俄派总管监督盛京将军的一切，按着这个章程规定，盛京将军的巡捕队，由沙俄总管发袖标，枪支编号码，中

国军队完全缴械遣散。这就是沙俄政府对清政府“素敦友谊”，“不据东省寸土”，“交还”东三省的实质。苏联早期的史学家罗曼诺夫对这个章程的性质，曾有过正确的评价：“将军都成了一种对俄国军事长官负责的机关，其作用为维持地方秩序。这显然是破坏了中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主权。”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签订的消息传出以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也被迫不予承认，以“擅立约章”的罪名，将增祺“革职”，沙俄对此事提出抗议，说“此明系与俄为难”，李鸿章又配合沙俄，奏请“俯顺洋情”，于是，清政府又恢复了增祺的官职，使其继续充当沙俄的傀儡将军。但是，沙俄政府却不得不同意“废约”。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不仅增祺是卖国贼，李鸿章也是卖国贼。11月13日，李鸿章收到周冕发自旅顺口关于签订暂且章程的报告，竟秘而不宣两个月，这中间却和乌赫托姆斯基共同炮制以光绪名义给尼古拉二世的国书，说什么“准将东三省地方交还中国官吏，俾文官得以治理地方之事，……感铭肺腑”。而乌赫托姆斯基回到上海又电李鸿章，转致阿列克谢耶夫的谢意，告诉他“满洲文官治理地方之事，全行重复旧规”，命他切告盛京将军“遇事不可掣俄官之肘”。所谓“文官治理”和“不可掣俄官之肘”，就是清政府地方官员当傀儡，由沙俄武装占据，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由此可见，李鸿章在签订这个章程过程中，充分扮演了沙俄走狗的可耻角色。

乌赫托姆斯基秉承维特旨意，在阿列克谢耶夫炮制暂且章程的同时，还让李鸿章“请两宫（指西太后和光绪帝）移蹕盛京，在彼与各国开议和局”。李鸿章知道办不到，所以没敢提。但是这件事，却更进一步暴露了沙俄称霸远东的野心！在它心目中，“黄俄罗斯”要实现了，再把清朝的中央政府弄到沈阳来当傀儡，全中国岂不都沦入沙俄的魔掌之中吗？然而，沙俄的好梦不长，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破灭

东北地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一开始其矛头就指向沙俄帝国主义，并且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地抗击沙俄侵占东北的群众武装斗争。其所以如此，决不是偶然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中国东北斗争中，沙俄已经取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垄断，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地方发生了反筑路、反占地的抗俄斗争。维特认为引起东北人民、地方官府和军队的“敌对行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从我们占据了关东（即旅大地区）之后”。东北的抗俄斗争极为广泛，包括爱国官兵和义和团，较大规模地武装反抗持续很久。这都是沙俄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东北的义和团运动，从其实质来说，是东北人民反筑路、反霸占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1900年初，营口、锦州、朝阳等地，已经在传播义和团的战斗口号和事迹。2月，营中附近居民在“预备杀逐洋人”的口号下，群起练拳。3月，锦州附近立团练拳，“乡野村庄，十有九信”。4月，朝阳一带的城乡穷苦人民和游民，“均学习义和团法”。到6月初端午节时，义和团已在盛亦城（沈阳）发展起来，6月中旬，盛京境内（辽宁省）“初则三一结伙，继则千百成群”，盛京城内各处贴满了揭露“外国人侵犯中国种种罪行”的揭帖，号召“一切善良的中国人，应该立即奋起”，把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的领土”。盛京将军增祺下令“严饬查拏”，企图扼杀群众的反帝斗争。但是，州县官员对主和团“惮于威势，不敢驱逐”，义和团运动在东北成为不可抗拒的浩荡洪流。

1900年6月26日，盛京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的铁路桥梁，阻止旅大地区的俄军北犯。30日，刘喜禄、张海为首领的义和团，在盛京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将城内俄、英等国的教堂和沙俄设立的铁路公司，拆毁殆尽。只剩下一处法国的天主教堂负隅顽抗。愤怒的义和团群众，经过一昼夜的奋战，在7月2日攻下了这个顽固的堡垒。7月中旬，整个盛京境内，“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除鞍山车站外，“所有俄国铁路桥房均被百姓拆毁”。各厅、州、县的外国教堂也几乎全部被焚毁。

盛京义和团发动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义和团运动。6月末，吉林省城开始组织义和团，沙俄侵略者闻风而逃。7月中旬，长春的义和团烧毁城内的天主教堂，然后把俄国修建的中东铁路二道沟火车站烧毁。吉林义和团冲破吉林将军长顺的镇压和破坏，到处打击沙俄侵略者，长顺电告李鸿章说：“吉林铁路，早经饬所属各军竭力保护。无如拳民遍地，不论中俄（铁路），一律毁坏，……防不胜防。”

7月，黑龙江省义和团壮大起来，他们开始向沙俄侵略东北的中心哈尔滨发动了围攻。爱国的清军也参加到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的行列。义和团东从阿什河，西从齐齐哈尔，南自双城，三面包围哈尔滨。割断电线，拆毁铁路和桥梁，将3400名俄国护路军和中东铁路公司的员工，围困在哈尔滨。7月22日，义和团发起总攻，俄军溃败，龟缩在松花江南岸市区待援。早在义和团围攻哈尔滨之前，中东铁路护路军，得到清朝地方官员的通知，撤集在哈尔滨，作了防守哈尔滨的准备。义和团和清军在进攻的过程中，吉林军队由于长顺的控制，没能按计划进攻，致使俄国侵略军得以守住哈尔滨。后来，由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溯江入侵的俄军到哈尔滨登陆，被围困的沙俄侵略军才逃脱被歼的命运。

沙俄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刺刀下的地方傀儡政权的过程，也是东北人民武装抗俄斗争的过程。东北三省义军“遍野”，“几乎无时不有，无地不然”，反抗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

哈尔滨是沙俄侵略东北的一个中心，中东铁路公司的所在地，也是沙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最深的地方。广大的筑路工人和被霸占了土地的农民，北起海伦、呼兰、东北的巴彦、东边的宾州（今黑龙江省宾县）、木兰、东边的阿勒楚喀（今阿城县）、五常，到处都有大股义军，形成了以大青山为中心的抗俄反清武装斗争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里，主要的抗俄武装力量是：1900年8月呼兰起义的刘振棠领导的“义胜军”和孙本荣领导的“义效军”。义胜军曾攻入俄军占据的厅治所在地呼兰。义胜军退出后，到年底，又有一支义军袭击厅治，“俄军溃出”。1901年初，这些义军汇聚到大青山，以后转战于呼兰、木兰、巴彦各县。

1901年2月，巴彦县人民武装起义，以大青山为根据地，拥立首领称号“占北”。薄老五、陶四机匠、丁老疙瘩、王三老虎、郝天波等各股义军，远近悉归。4月17日，突入巴彦，袭击俄营，焚毁县署，哈尔滨为之震惊，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军。到1901年底，哈尔滨以东的义军，因缺乏统一组织，各自分散地游击活动，被沙俄侵略军和清朝地方部队以及地方武装“团

练”所镇压。一部分南下转移到吉林东部，继续抗击俄军。

活动在三姓（依兰）一带的义军，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到了3万人。这支义军经常袭击俄军营地。

吉林东部山区敦化、蛟河一带，形成另一个抗俄反清的中心。1901年6、7月时形成高潮。主要的队伍有湖南刘（即刘罗锅子）领导的义军，从宾州南下，和俄军、吉林将军长顺的地方军队多次作战，其一部韩甸沉领导的队伍，汇集到敦化、蛟河之间活动。马德超和孙楼所领导的抗俄队伍，也活动在敦化、蛟河两县。

驰骋在东北抗俄战场上的义军，汇集为忠义军。忠义军主要是由三支抗俄队伍组成。一支是王和达领导的活动在通化、海龙、磐石一带的抗俄队伍。王和达起初参加了义和团，并且被推选为法师，接着组织武装起义成为忠义军中的骨干力量。另一支是活动在珲春一带的“游民”武装，主要是由破产农民、失业的筑路工人、矿工、伐木工人及猎户组成。1900年7月，当沙俄入侵珲春时，这支队伍主动配合珲春副都统英联率领的清军，保卫珲春。还有一支是以吉林南岗等处矿工为主的“游民”武装，当沙俄侵越乌苏里江时，吉林将军将这支武装收编的“垦务营”，称作镇东军，驻在宁古塔一带垦荒。1900年8月，沙俄侵略军进攻宁古塔，这支队伍同宁古塔人民一起，奋勇抗击沙俄入侵。珲春失陷后，守卫珲春的这支武装，经过敦化南下，与吉林将军长顺决裂，自树旗帜，称作忠义军，此时已发展到3万多人。1900年11月，忠义军奔袭朝阳镇后，宁古塔附近的镇东军，向南发展，来和忠义军会师。此时，清海龙城总管依凌阿勾结俄军高哩巴尔斯统率的部队，南北夹击驻守朝阳镇的忠义军，忠义军识破敌人诡计，主动撤出朝阳镇，向东发展、攻取清军驻守的通化。俄军在忠义军撤出朝阳镇后，先后在朝阳镇和海龙烧杀抢掠，然后退回沈阳。1900年12月16日，镇东军进入海龙。王和达率领的义和团余部进入朝阳镇。至此，这三支抗俄队伍联合起来，统称忠义军，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并且健全组织，总帅称统领，下设“帮统、分统、总巡、稽查、营、哨等官各名目……派队散粮，护送难民，民……多有感颂者。到1900年底，开辟了辽东山区的抗俄斗争区，肩负起反对俄军占领、反对清朝妥协投降的历史重任。

1901年初，忠义军在海龙南山伏击俄军取得胜利。沙俄关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派遣大军分三路向通化、海龙一带发动了疯狂的围剿，清朝地方官员密切配合，对忠义军实行诱降。自1901年3月下旬到4月29日近40天间，忠义军集中主力进攻清朝皇帝祖先陵墓（永陵）附近的新宾堡及其附近的老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个都城）和永陵，并兵分在各地牵制俄军。战斗结果，重创俄军和清副都统灵熙的军队，俄军败回沈阳，阿列克谢耶夫大为震惧，增祺更是惊恐万状。为防备忠义军进攻沈阳，俄军“驻兵城外，挑挖巨壕，置炮城上以防之”，“一日数警，有不可旦夕之势”。

忠义军在新宾堡大胜以后，“移檄”分兵，到1901年6月，海龙、通化、新宾、桓仁、宽甸、凤城、九连城、山城镇、安东（丹东）岫岩等厅、县、城镇连成一片。有爱国思想的清朝下级官吏有的率部参加，有的“供役使”。忠义军一部“西犯辽阳，……增祺请求俄将甘都鲁马大力罗夫率重兵”堵截。另一部活动在康平一带，王和达部在朝阳镇四出打击俄军，辽吉两省的东部全归忠义军控制。

忠义军最盛时约有20万人，分为40营，在俄国侵略军和清朝地方政权

勾结的强敌面前，展开反占领、反卖国的斗争，坚持战斗到1903年秋，最后在中外敌人的残酷绞杀下遭到失败。但是，忠义军的英勇的爱国气概，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史上是永放光辉的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才狠狠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军。库罗巴特金供认：“俄国军队是分散而被围在敌视我们的中国群众中。”维特也无可奈何地哀叹：“……满洲最后归并俄国，这方面还会有非常严重的困难。”历史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的只是一小撮反动统治者，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则是坚强不屈的历史主人。

威武不屈节 国权舍命争——杨儒

东北，伟大祖国版图上的的一颗明珠。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沙俄曾把她置于股掌之上，欲窃为己有。对此，一位舍生忘死、勇于虎口夺食的爱国外交家，同沙俄侵略者作了艰苦的斗争，使东北大好河山得于垂失，维护了祖国的利益。他，就是当时不畏强暴、捍卫中国主权而名扬中外的外交家——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不辞重任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从。1861年，他以监生捐得员外郎后，在兵部办理军务。1888年起，先后出任江苏常镇通海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3年后转任驻俄国、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西北地区150多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又把掠取整个中国东北作为它的侵略目标。1896年，以助华抗德为名，强租旅大；1900年，又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叫嚣要用刺刀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01年1月1日，杨儒以驻俄公使身份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沙俄谈判交收东北三省问题。

杨儒受任于国难当头，他身处异域，势单力孤，是在一群野心勃勃的强盗中间周旋。当是，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清廷君臣逃到西安。此时此刻，要维护祖国的权益，特别是要在强盗嘴里夺回一颗晶莹的珍珠，真是千难万难。

谈判从1月4日到4月6日，历时3个月，杨儒等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分别会谈22次。

1月3日，杨儒读到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沙俄与清政府已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沈阳派驻“总管”，奉天将军所办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阅后，气愤地说：“这不是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奉天的主权吗？”可是，他又感到奇怪：为什么朝廷不把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通知他这个驻俄公使呢？杨儒即去维特处质询，证实确有其事。杨儒及清廷至此如梦方醒，才知道沙俄炮制了这样一个侵犯中国主权的文件。原来，沙俄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为了制造“合法”根据，力图与清政府秘密交涉签约。由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逃西安，所以，就软禁了盛京将军增祺，要他派

人去旅顺“谈判”交还奉天问题。失去自由的增祺，只得让已革道员周冕前往。岂料周冕一到旅顺，放在他面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拟就的这份章程。在沙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周冕被迫签了字。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毫无所知。当时，奕劻、李鸿章正与占领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谈判《辛丑条约》杨儒远离祖国，身处群魔环伺的龙潭虎穴，处境极为艰难。要收回东三省，无异虎口索食，挽狂澜于既倒。杨儒感到，这是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义不容辞。他抱定宗旨：新订条约必须无损中国的兵权、利权、行政权，而且一定要措辞得体，行文严密，使别国无法从此效尤。

不畏胁迫

中俄交涉首先围绕《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展开。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维特和拉姆斯多夫凭强凌弱，在谈判桌上气势逼人，他们坚持要杨儒首先承认“暂且章程”，然后再议正约。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难允准！”维特说：“章程已经中国官员签字。”杨儒驳斥说：“这是已革道员擅自画押，并未请示，政府更不知情。章程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罢废。”此时，帝国主义分赃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俄国急于在各国与清朝签订条约之前，先行与清朝订约，造成既成事实，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法干涉。因而俄担心由于“暂且章程”的争论影响正约的谈判，经过6次交涉辩驳，只得于1月23日允废暂约。

沙俄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在谈判“暂且章程”时，维特曾口头提出过“十三条款”。转入正约谈判后，又先后抛出两个约稿，即2月16日的“十二条款”和3月12日的“十二条款”，并声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这3个约稿大同小异，主要内容是：（一）东三省中国只准设巡捕兵，名额须与俄协商；（二）东三省简放将军，须先与俄商明；（三）满洲、蒙古暨中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于他国；（四）满洲、蒙古等地中国不得建造铁路；（五）金州城归于俄国租借地；（六）满洲税关由俄人代理；（七）山海关至营口铁路俄愿出资购买。观其要点，则东西省名虽存而实已亡，把中国北部诸省均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杨儒一针见血的指出：俄国是欲将东北像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一样，所谓“交地”有名无实，道破了沙俄要把东北变成殖民地的要害。维特大为不满，认为杨儒视俄国未免如疯子愚人一般。杨儒对约稿提出“三驳三改”的意见，对其中关于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划归租借地、驻军及蒙古、满洲路矿利益等问题一一予以驳斥，实际上是对约稿基本否定。

闯入邻人家室肆意抢劫，还说自己吃了亏，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维特大讲俄在东北损失巨大，什么铁路被毁，兵士伤亡，耗费巨款，等等。杨儒针锋相对：若当时铁路不造在满洲境内，何至如此！有力的反驳，使得维特恼羞成怒，大发肝火。

3月12日，沙俄把原先的十二条款作了一番删削，提出最后改稿十一条。这个修改稿，只是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妄图独占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拉姆斯多夫声言：“此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五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3月15日，沙俄外交部威胁说：“约稿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决，一言而决！”3月18日，又加逼迫：“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

沙俄侵略者在谈判中耍尽了手腕，首先是欺骗、贿赂。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以和杨儒交情甚密进行笼络。杨儒说：公事与私交是截然两事。我不顾中国利益便是不忠，诸位大臣可无须看重此友。“我为中国办事，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杨儒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祖国和民族分利必争，寸步不让。俄提出最后约稿后，又一次对杨儒利诱收买，如杨儒答应画押，俄国可在“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杨儒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俄方另一卑鄙伎俩是威逼恫吓，企图迫使杨儒就范。维特恫吓说：中国刻下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国之自便。拉姆斯多夫蛮横多称，对“十一条款”约稿一字不得再易，倘15天清政府不肯画押，则我等不便见面。杨儒毫不示弱，愿“束装以待”，宁肯与俄决裂，被清廷治罪，也不出卖祖国权益。

沙俄紧逼，清廷推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均欲逞一己之私，立待效尤。当时清政府主持外交的是奕劻和李鸿章，他们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早已屈服了。这时，他们见最后约稿已把刺目的字句删去，五天内三次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令他“即酌量画押，勿误！”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则无定见，军机处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也于3月23日电告杨儒“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杨儒，至此，杨儒受到内外压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朝廷把签字画押的权力交给自己，该签而不签，那将负多大的罪责呵；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又怎么可以答应呢！

正在此时，他收到了国内督抚和各地绅商的电报，纷纷要他拒签条约。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近千人两次在味莼园（张园）集会抗议，数十人慷慨演说。3月17日致电杨儒：俄约激动全局，大祸立起，士民公愤，乞力挽。”并且通电各省：“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还致电朝廷，乞“力拒俄约，以保危局”。香港、澳门、新加坡、檀香山的爱国华人，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俄约。一些爱国官员和驻外使节，也劝杨儒“统筹全局，格外慎重”，不要轻率签约。读着一封封义正辞严的电文，杨儒心中踏实了，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立。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断不受俄人之逼迫”，表示除非奉朝颁发确旨，否则决不签约。

不辱使命

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得这个年已古稀的老人身心交瘁；强敌的凶横，国内妥协势力的破坏，使他忧愤交加。3月22日，他回使馆时不幸雪滑坠地，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沙俄得知清廷已让杨儒“全权定计”，能否签约，在于杨儒一人，便于3月24日约见杨儒。杨儒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在别人的搀扶下带疾前往。维特欺哄杨儒如3岁孩提，说：“贵国军机处既有全权定计酌量画押之令，贵大臣为何不肯画押？”杨儒答道：“非明奉朝旨，何能自行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维特马上接口：“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冷笑一声，回答：“私自画押，该罹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维特又摆出俄国“国际警察”姿态，口出大言：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听此收买之言，顿感莫

大耻辱，怒不可遏，他正颜厉声痛斥：“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义正辞严，铮铮有声，显示出一位爱国者的高风亮节。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再一次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展缓时日，继续谈判。拉姆斯多夫威胁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此事了！”并限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一日之限，弹指即过。该怎么办？杨儒忧心如焚地转回公使馆。这时，刀削似的寒风夹着雨雪漫天飞舞，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了，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午刻，刚刚苏醒过来的杨儒，忽然接到朝廷的谕旨：“不遽行画押！”原来，沙俄迫订条约引起了列强的密切注视，英、日、美、德等国都不愿沙俄独吞奉天，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订约。清政府感觉到，“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押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在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民催促下，清政府才电令杨儒不在沙俄约稿上签字。杨儒当即派译员将电文送往俄国外交部。拉姆斯多夫知大势已去，但又拿出无赖的腔调恐吓：“现在无话可说，中国自看以后情形可也！”4月6日，沙俄政府发表宣言，声明这次谈判暂作罢论。至此，中俄交收东三省的谈判宣告破裂。

3个月的谈判中，杨儒据理力争，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这次谈判，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没有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的谈判。这次胜利，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杨儒“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不避艰难，力顾大局，“实大有功于国家”，不愧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外交家。

心系祖国

杨儒登上外交舞台，是从1892出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开始的。一个贫穷落后、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的官员，一旦走向世界，看到美国这样国家的先进经济文化，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杨儒忧国忧民的思想从此日益强烈。

1894年，中美在华盛顿谈判有关华工待遇问题，杨儒为改善华工社会地位全力争辩，使所订条约的一些条款多少反映了华人的利益和要求。

1896年，杨儒调任出使俄、奥、荷三国大臣。

1899年4月，杨儒代表中国赴荷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公会”。后来，他认识到“保和公会”并不能保卫世界和平，不过是俄国利用它来欺世盗名罢了。

杨儒身在国外心向祖国，关心祖国人民的疾苦。他热心于红十字会慈善事业，表示如能回国，深愿力任此事，并捐俸银5000两，寄予忧患中的祖国人民一片深情。

1901年1月，西太后在西安颁布上谕，准备实行“新政”。杨儒本年4月至7月间正在德国就医，听到“变法”消息，便离开病榻，秉笔直书，写成达万言的变法奏折，提出了“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集众长”的“六策”。其宗旨是，“舍富强难图立国，舍变法莫致富强”。要通过变法改革弊政，补救时艰。

紧张繁重的外交活动，使他积劳成疾，与俄谈判，他几乎耗尽心血。到

德国治疗一个时期后，又回到俄国。1902年2月17日在彼得堡逝世，以身殉职。他留下的著作有《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俄事纪闻》、《杨儒变法条议》等。

从他在任驻外公使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克尽职守。他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特别是在中俄谈判中，甘冒风险，力挽狂澜，为维护祖国的权益作出巨大努力。

沙皇俄国变我国东北为殖民地的梦想破灭了。但是，杨儒要“预防强邻之凭陵”的告诫，却是值得注意的。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1901年冬天，一艘从四川重庆东下的客轮，穿行在三峡江面。汽笛一声长鸣，四处的山谷立即响起了悠扬的回声。这时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挺立在船头，壮丽的山峡景色激荡着他的心胸，而他的心却被谋求祖国出路的宏愿引向了远方。这个青年的名字叫邹容。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巴县人，出生在中法战争失败的那一年。这年代，中国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12岁那年，邹容曾跟着哥哥参加巴县的科举考试。在考场上，他对词意晦涩的试题不甚了然，要求主考官解释，竟遭到拒绝。邹容当场和主考官顶撞起来，愤而退出考场。这是他和封建制度所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当时的维新运动已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展开，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渐渐传入万山重叠的四川，邹容接触到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思想受到了启发。他决心抛弃“臭八股”，另选新的道路。

出国留学的风气这时开始盛行。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国家学习很快地强盛起来。日本成功的经验，吸引着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都想到日本看看个究竟，去寻求些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离中国近，到日本去容易，因此留学日本的人特别多。1901年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二百人，5年后便猛增到8000多人，出国留学逐渐形成了热潮。邹容就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下定东渡日本的决心的。

1902年春天，邹容到达上海，为了减少留学日本语言的障碍，他先在上海逗留，补习日语。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侵略的严重性，在这里集中表现出来。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邹容的心灵烙下了沉痛的创伤，激起他对清政府卖国罪行的愤恨。不久，他就继续踏上征途，从上海动身去日本东京。

那时，凡是留学生一到日本，都急于寻求新的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是去留日学生会馆，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互相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当时，革命和改良两种思想，在留学生中正展开激烈的斗争。大批留学日本的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们在国内已受到人民群众斗争的影响，到国外又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识很快地提高，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火热的生活中，邹容的思想也很快地跨进了一步。1903年春节，一千多名留学生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这实际上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邹容登台演说，言词激愤，激发了到会人的斗志。从此，他每会必到，成为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最年轻的一名激进分子。

这年4月，留学生中展开了“拒俄运动”，事情是这样的：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时，沙俄趁机强占中国的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的侵略军陆续撤走，沙俄军队却继续赖着不走，因此激起了全国拒俄运动的浪潮。留日学生也闻风而动，如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邹容是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义勇队的队员。

邹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参加火热的爱国斗争外，还阅读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革命的烈火在他的胸中越烧越旺。他决心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唤起更多的人投入战斗。他把书名题为《革命军》。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对邹容的反清活动深为不满，逼迫他中止留学，回到上海。

这时候，从日本回国的蔡元培、章太炎已在上海设立了一所爱国学社，吸收爱国青年入学。邹容一到上海，就进入爱国学社，和章太炎相识，章太炎比邹容大18岁，已是个有学问而且闻名的革命家。他们很快地成为战友。

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从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还幻想清朝统治者有朝一日会变得开明，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利用过去的理想，大肆宣扬保皇、立宪，想拉拢青年，抵制革命。这些在戊戌变法时起过进步作用的人，已被时代所淘汰，不再是进步分子，而是抵制革命的顽固分子了。邹容很快就看到了这伙人的为虎为伥的真面目，和章太炎一起，对立宪派的反革命言论猛烈地开火。

邹容以他酣畅淋漓的笔墨，写完了在东京时就已经着手的《革命军》一书。“革命军”三个字，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它的矛头不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也给了立宪派当头棒喝，否定了他们所谓“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

《革命军》猛烈地抨击清朝政府，指出这是个卖国的政府，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它高举革命的旗帜，反复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声疾呼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书的末尾，还满怀激情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革命独立万岁！”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本系统地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书。《革命军》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它热情奔放，豪气纵横，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它一问世，就像给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掷出了一颗重型的炸弹，立刻震动全国，得到了革命者的热烈欢迎。有的人书一到手，“三读不厌”；有的人买不到书，借来连夜抄写。孙中山先生曾出钱刊印1万册，分发各处去用来宣传革命。因此，短短的几年时间，《革命军》发行了100万册以上。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动凌厉的攻势后，立刻遭到清政府的高压。1903年，上海发动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这年5月，上海《苏报》刊登了《革命军》的“自序”，发表了两篇介绍《革命军》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保皇谬论，还把他们捧为“圣上”的光绪皇帝称作“载暑小丑”，说他“五谷不分”。这一下，可把清朝统治者气得暴跳如雷。

清朝政府立即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

容和报馆的有关人员，把他们判处徒刑。

章太炎和邹容在狱中被罚做苦工，吃不饱饭，还受狱卒的欺压，邹容心不能平，十分愤激，到 1905 年 2 月终于病倒，4 月初就死去了。这时他才 21 岁。

邹容不屈不挠，最后牺牲在狱中的事迹，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也赋予《革命军》以更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风行海内”，教育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党人，对掀起资产阶级的革命高潮起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政府绞杀革命言论的手段，是徒劳的，就在邹容发表《革命军》前后，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写成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浅显通俗的文字，热情歌颂伟大的中华民族；愤怒控拆清朝政府卖国和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起了同样的作用。

革命思想正逐步转化为行动。早在 1904 年，爱国文学社的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革命党人吕大森、张难也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这些革命的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目标，积极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渐汇成全国革命的洪流。

山阴徐君 生肖其辰——徐锡麟

1907 年 7 月 6 日晚，安徽督叔练所内，清朝官吏藩司冯煦、臬司毓朗正在用酷刑审讯安徽警察处会办、巡警学堂监督。只见审者神气活现；受刑者则傲然挺立，坦然自若，他的豪然正气，使那些清廷的高级官吏惊魂失魄。这位受审的年轻的巡警教官，便是第一次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徐锡麟。他用自己捐肝献胆为革命的爱国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练兵习武

徐锡麟，字伯荪，号光汉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73 年 12 月出生在一个有田百亩的富商家庭。父亲徐凤鸣思想保守顽固，对儿子的管束全用封建礼教那一套。徐锡麟 12 岁那年，因不满父亲的经常责打，独自负气跑到钱塘当了和尚，后经家人找回，才上学读书。他从小学习用功，尤爱算术、天文、地理。每当更深夜静万籁俱寂时，他便匡立室外，仰首太空，观察星位，细心画出许多天象图；他还自己动手制作浑天仪，绘制绍兴地图。21 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父亲以为他会青云直上，但他藐视功名，胸怀自己的抱负。

1900 年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高涨，帝国主义联军入侵，更使他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感到非武力不足以解救民族的危亡。徐锡麟主张速创团练自卫，抵拒侵略。他爱憎分明，沉毅果敢。当时绍兴天主教会为非作歹，谋霸大善寺，纠集地痞流氓胁迫寺僧出租转让。徐锡麟气愤已极，虽正患疟疾，却立即身裹被絮，赶到现场，凛然登坛抗议，坚决反对，当众烧毁“借券”，挫败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1901 年，徐锡麟到绍兴府学堂任教，被举为算术讲师，“任教不到数月，声誉鹊起”。后提升为这所学校的副监督。“在校四年，弟子益亲如家人”。在这期间，他向学校倡导科学，特别强调体育训练，想以此改变中国军事、

政治落后的状态。

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朽无能，而有志于解救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则忧国忧民。他们倾向革命。追求新学，已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1903 年，徐锡麟以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的名义东渡日本，到东京游览。当他在东京博览馆里看到陈列在那里的两座中国古钟时，尤为感慨，愤然作诗道：

瞥眼顿心惊，分明故物存。
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
在昔醒尖梦，而今听品评。
偶然一扪试，隐作不平鸣。

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浙江学生正积极设法营救被中外反动派逮捕的爱国学者章太炎先生，并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抵抗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热血沸腾的徐锡麟深为留学生炽烈爱国激情所感动，他当即参加了这些爱国活动，捐款资助，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者。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一次次的爱国救亡运动和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徐锡麟的思想不断进步，他忧虑民族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命运、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回国后，徐锡麟在绍兴办学校、设书局，积极提倡军训，宣传反清思想，传播革命知识，自己更是经常练习射击。这时沙俄侵略中国，妄想把我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消息不断传来，徐锡麟对此怒火万丈，他特意将自己射击的靶子绘制成一个沙俄侵略者的凶丑木偶，每天朝它练习射击，以倾泻满腔的民族义愤。一次打靶，不慎肩部受伤，殷红的鲜血渗透了衣裳，他毫不在意，反而更加勤奋地坚持射击练习。

1904 年底，徐锡麟到上海慕名去爱国女校访问了蔡元培和陶成章，欣然参加了蔡、陶组织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和他们一起讨论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宗旨和策略。听了陶成章介绍的联络浙江会党的情况后，徐锡麟很受启发，不久便带领几名学生到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县积极从事联络会党的活动。他们常常白天步行百里，夜宿丛林。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活动，徐锡麟结交了一些被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看到了会党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清革命力量，很受鼓舞。他充满信心地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结识了绍兴、金华一带会党头领的同时，徐锡麟感到，革命迫切需要一批体格健壮、谙熟军事的勇士。因此必须对这些会党头领进行军事训练。1905 年，他便在绍兴创办体育会，招集数百名青年学生组织训练，学习军事技术，练习射击。女革命家秋瑾也参加过学习。是年 4 月，徐锡麟以体育会的合法名义，公开从上海购置了后膛九响枪 50 支，子弹 2 万发。9 月他又和陶成章等人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后设体育专修科），以办学名义掩护光复会的革命活动。“于普通科目外，尤重兵式体操，六阅月而课毕”，把大通学堂作为革命的军事学校和联络机关。大通学堂招集金华、处州（今丽水）、绍兴三府所属的会党骨干前来进行军事训练，并且规定：凡入校学生必须是光复会员，毕业后必须接受学校领导人的统辖和节制。徐锡麟不仅常开演说会宣讲民权之说，而且身先士卒，亲自组织操练军事，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大通师范学校不仅成为一个播种革命的园地，而且“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这年冬，同盟会会员、女革命家秋瑾在徐锡麟的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更加强了浙江革命组织的领导力量。

徐锡麟认为“非握兵柄，不足举大事”，因而在创办学校的同时，他接受了陶成章的建议，准备花钱捐官学陆军，打进清政府军队内部，“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不久他动员富商许仲卿出钱、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花了3000两银子，捐得道员；又贿赂署浙江巡抚寿山，获准去日本学习陆军。1905年冬到1906年初，徐锡麟先后两次去日本，准备进陆军联队、振武学校、陆军经理学校和警政学校，都因近视等原因被拒绝。但徐锡麟仍抱定宗旨，毫不灰心。1906年春，他从日本回国，北上京师，出山海关，周游东北辽宁、吉林一带，察看形势，广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联络革命力量，并运动“马贼”，准备为革命所用。这期间，在东北徐锡麟面对沙俄与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的角逐，无限感慨，他在《出塞》诗中写道：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这期间，他仍以谋取军职为目的，往来奔走于清廷权贵大吏之间。是年冬天，徐锡麟被准以道员身份分发到安庆试用。他将大通师范学堂委托秋瑾主持，并约定今后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互相呼应。1906年11月徐锡麟到杭州候补，他赠言秋瑾等人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级，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请君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表示了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

安庆起义

徐锡麟到安庆任职，由于他本人办事干练，再加上表叔俞廉三的关系，深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屡被提升。他先任武备学校副办，继任警察处会办，次年，又任巡警学堂堂长。在巡警学堂，徐锡麟白天身着戎装，督练操课，晚上置酒设菜，饮宴将士。他工作认真，关系融洽，声望极高。同时他还以合法身份，广泛交流，在敌人营垒内部开展了初见成效的分化瓦解工作。在校内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秘密工作，对思想进步的学员开展革命宣传，讲解国内外形势、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前途等问题；在校外又与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恒芳、督练公所学员龚振鹏等关系密切；对在安庆的新军（六十一、六十二标）积极开展争取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积极积聚力量，徐锡麟还派同志陈伯平、马宗汉在浙江、安徽两地往来联系，互通声气。两省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革命党人的活动，清政府已有所觉察。6月，秋瑾通知徐锡麟，浙江方面的革命活动已为敌人注意，决定先法制人，要求安徽、浙江两省会党于7月19日同时起事，约定徐锡麟响应。徐锡麟也发现安徽革命党人随时有暴露的危险。7月1日，光复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革命党人名单，他还特别供出了“有个混入安庆官场的浙江人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情报。但叶仰高知道的只是这些革命党人的暗号或别名，并不知道其真实姓名。两江总督端方将这个重要情报电告安徽巡抚恩铭，要他严密查拿。恩铭接电，立即召见徐锡麟商议，却没有想到名单上第一个赫然是徐锡麟的化名。恩铭要徐锡麟执行。徐锡麟当即机智地敷衍过去，但由此推知意外事变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决定赶快动手，提前在7月8日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

时起义，并通知秋瑾，请浙江会党派兵予以援助。为料，恩铭那天另有他事，命巡警学堂提前两天举行毕业典礼。情况突变，徐锡麟唯恐夜长梦多，机密泄露，于是当机立断，不待浙江援后汇合，也没联系安庆军界其他革命党人，仓促决定于7月6日的毕业典礼刺杀恩铭举旗起义。他与陈伯平、马宗汉3人在7月5日连夜草拟印制《光复军告示》，整理武器，匆忙进行了起义前的临战准备。

1907年7月6日凌晨，徐锡麟等人潜入花厅，埋下了炸药。清晨，徐锡麟召来巡警学堂学员开会。他精神抖擞、情绪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反复强调：“我此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记‘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徐锡麟铿锵的言辞，听者无不为之振奋。

早饭后，巡警学堂上下气氛十分热烈。8时左右，恩铭和其他官员乘坐的50多乘轿子，显赫地来到这里。恩铭安排到巡警学堂原是先酒宴，后检阅。不知怎地，恩铭中途变卦，改为先检阅，后设宴。

徐锡麟接到恩铭改变计划的通知，心中疑虑俱增，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如不及早行动，势必造成被动。于是，他迅速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与陈伯平、马宗汉使了个眼色，并下达命令：先检阅，后酒宴；人人遵守，不得贻误，误者处罚。

上午9时，典礼开始，恩铭率一班高级官吏来到巡警学堂的第三礼堂。按照规定，先由守卫在礼堂旁的官生班向恩铭等人行鞠躬礼，再由兵生班行礼。在这时刻，徐锡麟突然举手行礼，呈上学员名册，发出暴动暗号，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事出突然，恩铭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说时迟，那时快，陈伯平迅速上前向恩铭投出一枚炸弹，炸弹在地上滚动，却没有爆炸。恩铭吓得魂不附体，其它官员也都目瞪口呆。马宗汉眼明手快，拔出手枪，一枪打中了恩铭的右手。正要打第二枪，可是怎么也打不响了。未等恩铭清醒过来，采取进一步行动，徐锡麟马上说：“大帅勿惊，卑职终当为大帅拿到！”边说边迅速从靴筒内拔出两支手枪，拿在左右手上，左右开弓，射向恩铭。恩铭身中7弹，立即倒地，被部下背走，不久毙命。礼堂内顿时枪声大作，其它官员纷纷抱头鼠窜。只有奸吏顾松被马宗汉活捉，由徐锡麟处死在台阶下。徐锡麟转身回到礼堂，抽出快刀，拍案高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随即率领30多名学员冲出大门，占领军械所，从库中取出枪炮弹药，不料有的口径不合，有的缺少零件，大多不能用。这时清军已关闭城门，包围了军械所，还悬赏7000金捉拿徐锡麟。在军械所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清兵死伤100多人，陈伯平不幸牺牲，徐锡麟、马宗汉受伤被捕。

捐肝献胆

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大大撼动了清王朝。从巡警学堂侥幸逃出的清廷高级官吏冯煦、毓朗、联裕等人当天便对徐锡麟进行了酷刑审讯。毓朗狂叫着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昂然不跪，轻蔑地说：“尔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刻，即被余杀。”有人问：“平时恩抚台待尔不薄，汝何忘之？”徐锡麟严正地回答：“恩铭待我甚厚，乃属个人私惠，我杀恩铭，因是排满公理！私交何得胜过公理！”徐还反问：“恩铭如何？”反动派诡称：恩铭只

受轻伤。徐锡麟有点泄气，低头不语。毓朗问：“余党共有若干？”徐答：“凡属汉人……欲救国而不为外人奴隶者，皆是余党。”联裕自我暴露道：“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顿时领悟，仰天大笑，声震屋宇：“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尝！我志既偿，即碎我身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徐锡麟指着毓朗，厉声喝道：“便宜尔，被尔逃脱。”毓朗大惊失色，几乎当场晕倒。接着徐锡麟挥笔写道：“蓄意排满已十年余矣，念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还写道：“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足断了，全身碎了，不可冤杀学生。”

7月6日晚，威武不屈的徐锡麟被押上安庆抚院前的刑场。他在敌人面前谈笑自若，视死如归。他神色自如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恨！”年仅34岁的徐锡麟无所畏惧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的心被清朝官吏挖了出来，祭礼恩铭；他的肝，被恩铭卫队掏去炒食，革命与反正，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如此尖锐地并列在人们的眼前。暮色苍茫，晚风如泣，徐锡麟的一腔热血洒在哺育他的祖国的土地上，滋润着拯救中华的革命之花。柳亚子先生曾对徐锡麟的殉难作诗哀悼：

慷慨告天下，灭虜志不渝。

长啸赴东市，剖心奚足辞！

爱国学者章太炎为悼念徐锡麟，谱写过这样一首壮歌：

山阴徐君，生当其辰。

能执大义，以身救民。

手歼虜酋，名声远闻。

女界先驱——秋瑾

秋瑾(1877~1907)，字璇卿，乳名玉姑，号竞雄，后自称“鉴湖女侠”。祖籍浙江绍兴，因祖父和父亲在福建厦门一带做地方官，曾将全家迁居厦门，1877年秋瑾就出生在那里。

死生一事付鸿毛 人生到此方英杰

秋瑾从小聪明伶俐，酷爱读书，十一、二岁就能写诗填词。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又读了不少经书、史书，所作诗词刚劲高亢，令人感奋，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她还特别爱读古代侠义小说，常以汉代游侠朱家、郭鲜自比，希望自己也能有一身好武艺，将来像那些男儿英雄那样，为国家干一番事业。15岁那年的初夏，秋瑾随同母亲一起来到萧山外祖母家，当得知舅父和表兄都有一身好武艺时，便拜他们为师。她学艺心切，加上心灵手巧，很快便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棒舞枪等各种武艺。她练武勤奋，闻鸡起舞，从不间断。不但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而且还养成了一副豪爽不羁的性格。她曾在《满江红》里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发出无限的慨叹和豪情。但是，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枷锁，限制了妇女的自由。特别像秋瑾这样的封建地主出身的官宦人家，封建意识更加浓厚，像秋瑾这样文武双全的女中豪侠，只能在家做闺阁小姐，这与她豪放直爽的性格格格不入。对封建家庭的束缚，她很不满意，经常和她一起往来的姐妹们。每当谈及她

的家中生活和读书感想时，无不痛苦怨恨。特别当秋瑾看到那些“洋人”耀武扬威、蛮不讲理、趾高气扬的样子，从心底里激起一阵强烈的恶感，更加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她首先认识到的是男女地位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太低贱，她的诗曾描写了妇女所处的“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的悲惨情景。她认为“人权天赋原无别”，并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千百万妇女的灵魂，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秋瑾 16 岁那年，因父亲调往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任职而入湘。由于她文武双全，才貌出众，来说媒的人纷至沓来。18 岁时，她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湖南湘潭的一个不学无术、庸俗不堪的纨绔子弟王廷钧。王廷钧虽然胸无点墨，却官瘾十足，依仗老子的财势，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秋瑾也勉强随夫去了北京，住在匠绳胡同，寓所恰好与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为邻。吴芝瑛是当时的革命新派人物，思想比较进步，颇负文名，在书法、诗词方面，造诣较深，她比秋瑾长十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志同道合，次年结为盟姊妹。当时，吴芝瑛的丈夫康泉开设“开明书局”，并与报界有往来，家中藏有许多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秋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籍报刊，视野大开，思想境界也不断升华。她写下的《宝刀歌》、《宝剑歌》，已充分显示出激昂的爱国热情：

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怪赤铁。
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

这首诗铿锵有声地表达了一位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爱国者的心声。1903 年春，秋瑾在《改琴文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具有特别浓重侠客气息的别号“鉴湖女侠”。此后，她着西装革履，头戴蓝色鸭舌帽，俨然一副“男子”形貌。她经常全副男装会客或出席宴会。在她身上已找不到半点低眉而行、细声细语、逆来顺受、万事皆傍男子的所谓妇道。这种鲜明的叛逆性格，使她同丈夫王廷钧及其家庭格格不入。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同侵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秋瑾来京时，北京城一片劫后凄凉惨状。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她再也按捺不住压抑已久的爱国激情，决心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拯救祖国的大事业中去。1904 年 4 月，秋瑾不顾丈夫的百般阻挠和反对，变卖了手中所有的金银首饰，与盟姊吴芝瑛挥泪而别，东渡日本，探寻救世真理。

祖国沉沦感不禁 只身东海“挟春雷”

黄浦江里，一艘满载乘客的海轮，徐徐向吴淞口驶去，浦江两岸的树木、村子慢慢地向后退去，江心白帆点点。秋瑾全身男装坐在窗口，贪婪地望着这即将逝去的一切，思前想后，心潮起伏。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她仿佛看到当年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海军前仆后继，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一股复仇的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当即挥笔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

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秋瑾与一起结伴而行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乘坐的轮船，由上海，穿东海，经长崎、神户，靠岸横滨，二人登陆后改乘火车来到东京。

秋瑾到达日本后，和其他留日中国学生一样，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学日语。数月后，秋瑾改入青山实践女校求学。在这期间，她一面学习，一面广泛结识在日本的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在日本，秋瑾发起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共爱会”，参加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并在“三合会”中被封为“白纸扇”（军师俗称）；还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的“十人会”。1904年9月，秋瑾与几位同志一起创办《白话报》，并以“鉴湖女侠秋瑾”的署名，在《白话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一文。接着在第二、三期上连续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我国同胞》等警世文章，鼓动“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争取男女平权，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除积极秘密地参加革命团体外，秋瑾还经常出席革命派组织的各种集会，登坛讲演。她的演讲言辞悲切，击中时弊，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落泪，因而具有很大的鼓动性。但秋瑾清醒地看到革命力量远远不足。不久，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并结识了和蔡元培一起发起发光复会的陶成章，以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

秋瑾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广施侠义之财，她慷慨解囊，资助长沙起义失败后来到的同志，直至经济拮据。

1905年春，为了筹措学费和探亲，秋瑾返回祖国。归国前，她写了一首题为《鹧鸪天》的词，以言其志：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雄，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首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崇高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她把自己比作一把锋利的龙泉宝剑，为了祖国和民族，时刻准备驰骋疆场，浴血奋战。

归国途中，友人向秋瑾索诗。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她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触景生情，吟诗道：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拜访了蔡元培，又在绍兴结识了徐锡麟，由徐锡麟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她还通过陶成章熟识了不少浙江地区的会党首领。

1905年夏天，秋瑾再次东渡。到日本后她更加广泛地接触了新事物、新思想，结交了更多的革命志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那光明磊落的品格，嫉恶如仇的个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志向，博得了广大中国留学生的敬佩。同年8月，经黄兴介绍，秋瑾在日本同孙中山见面畅谈，第一批加入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革命思想武装了秋瑾，也改造了秋瑾。从此以后，她在日本各地奔走联络。这时，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身着男装，佩戴着日本商店买来的一柄锋利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曾在《宝刀歌》中说：“莫谦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一洗数百年国史之奇羞”，充分表现了她为国雪耻的豪情壮志。

满清政府为了阻止革命，唆使日本政策文部省颁布《取缔留日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一消息传业，群情激奋，中国留学生纷纷罢课、集会表示抗议。秋瑾组织敢死队，自任指挥，与日本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肯作罢。对此中国留学生中一部分人产生“忍辱求学、以候未来”的思想；秋瑾等人则力主回国，义不受辱。在浙江同乡会上，她慷慨陈词，随手从靴筒中取出一把倭刀，猛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顽强的斗争，迫使日本政府作出让步，“规则”没能得以执行。

斗争实践使秋瑾清楚地认识到，要拯救“黑暗沉沦”的祖国，必须发动更多的民众起来斗争，她毅然带领大批留日学生回国，直接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斗争，去实践她那“我欲双手援祖国”，“频倾赤血救同胞”的伟大报负。

男女平等天赋就 岂甘居牛后

少女时代的秋瑾，就大胆地提出“红颜谁说不封侯”，明其抱负。后来，她饱受封建婚姻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对男尊女卑、妇女无权的封建礼教更加痛恨，并且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04年春，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重重阻挠，变卖了嫁时衣饰，出国留学，便是向封建礼教的一次宣战。到日本后，她身体力行，积极进行争取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斗争。她和浙江同乡留日女学生，发起组织了妇女团体“实行共爱会”，并通过这个组织，帮助因“苏报案”而亡命日本的陈范的两名小妾脱离家庭，独立谋生。当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迫于父命，准备嫁给一个广东富商为妾时，秋瑾发动全体留日女同学起来斗争，迫使陈范取消了这门亲事。

秋瑾在留日期间，写了许多主张男女平权的作品。她精心创作了情词悲壮、感人至深的弹词《精卫石》，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1907年，她在上海筹资创办了《中国女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她亲自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发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侪，恢复江山劳素手。

这首歌曲虽然谱曲比较简单，但歌词通俗感人，是秋瑾主张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代表作。《中国女报》虽然只出了两期就被迫停刊，但她在《中国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文章和诗词，这些作品都是影响深远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以妇女痛苦的遭遇，控诉了封建制度和男尊女卑的纲常伦理，揭示了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和摧残的原因，提出了关于妇女解放的

一系列主张，还号召妇女把自身解放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去。她所宣传的主张，都达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秋瑾坚决实践自己所宣传的主张，带头反对妇女缠足，强烈谴责这种戕害女子的恶俗。早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她就扔掉了裹足布和三寸弓鞋，穿起了男式皮鞋。

秋瑾猛烈抨击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将它斥之为“瞒天谎”、“荒唐话”。她根据“天赋人权”的学说，理直气壮地宣布：男女平权。她在《精卫石》中写道：“天生男女，四肢五官，才智见识、聪明勇力，俱是同的；天职权利，亦是同的。”而妇女过去之所以没有文化，缺少知识，都是万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1906年返回祖国后，秋瑾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期间，勉励学生努力学习生产技艺，取得独立谋生的手段，以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后来到了上海，又全力支持上海女校的工作，她为提倡妇女教育，作出了很多贡献。

秋瑾不仅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出色的宣传家，而且是一个勇往直前的革命实践家，她在为争取民族解放，特别是在妇女解放斗争中，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先驱者的光辉典范。

虽死犹生 牺牲尽我责任

1906年冬，秋瑾、徐锡麟、王金发、周昌华等会党领袖，在上海北四川路祥庆里一幢老式楼房的二楼集会。会上他们决定在浙皖两地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并商定徐锡麟负责安徽方面的起义准备工作；秋瑾在浙江发动会党，组织义军，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907年春，秋瑾离沪归里，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在校内特别增设了体育专科，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她还利用当时绍兴知府贵福以前曾和她父亲同过事的便利条件，取得官府公文护照，名正言顺地从上海买来枪枝弹药。为训练学生，还从各地抽来许多干部，到校担任教官。为了更广泛地组织民众和训练骨干，公开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秋瑾自任教练。她通过“体育会”的活动，聚集了好几百名男女青年。她身先士卒，经常身穿男装、怀藏手枪、腰佩倭刀、跨上骏马，带领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大通学堂学生几乎都成了光复会会员，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迅速发展到六七千人，起义条件逐渐成熟。徐瑾、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反清武装起义，他们日夜奔忙于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之间。有时她餐风宿露，策马于峻山丛林之间；有时，她斜背黄布袋，手攥佛珠，假扮成香客，赴杭州南屏山下的白云庵与会党领袖秘密集会议事；忽而划着乌篷船，扮作客商，去省城杭州刺探动静。她满怀激情，渴望战斗。为了祖国和民族自由、民主，她时刻准备不惜为祖国牺牲。秋瑾和徐锡麟原来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庆，秋瑾在金华、绍兴等地同时起义，消灭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队。秋瑾把全部革命力量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的顺序分别编为八个军，总称为“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协领。计划确定之后，大家兴奋异常，秋瑾心情更为激动，当即取倭刀挥舞起来，高兴地说：“宝刀！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满清政府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十分恐惧，派出大批侦探到处侦察、搜捕革

命党人。但由于台州义军首领裘文高擅自于6月中旬提前起义而被清政府官兵打散；7月初，武义县的刘耀勋部和金华的徐买儿部，又因走漏风声而被捕殉难。徐锡麟被迫单独于7月6日提前起义，他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在安庆将他挖肝剖心处死。

由于过早地暴露了目标，因而打乱了起义部署，使秋瑾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情势十分危急。当地得知徐锡麟壮烈牺牲的噩耗时，悲痛欲绝。她极力抑制住悲恸，向桌上猛击一掌说：“革命未成死不休，得拼下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更加注意革命党人的活动了。当清政府探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还是浙江会党活动的主谋人后，便下令派兵去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的师生建议提前起义，先攻占绍兴，杀死贵福，再图大事。秋瑾则认为，绍兴革命力量太弱，不能让同志们去硬拼，作不必要的牺牲。革命党人王金发也秘密来绍兴，力劝秋瑾撤离安全地带。秋瑾对同志的劝告非常感激，但不肯出走。她将重要文件交与王金发，毅然表示：“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敌人拼一下。革命是要流血的，没有鲜血，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希望你再接再厉，重新组织已失散的同志，再努力干下去吧。”并随即将一部分学生疏散。

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秋瑾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她追念徐锡麟、陈伯平等许多同志的殉难，浙江起义的失败；想到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不觉潸然泪下。她从书橱里找出一瓶醇酒，满斟一杯，一饮而尽。接着轻吟自己在日本时写的吊吴樾烈士的旧作：

死难同胞剩血痛，我今痛哭为招魂；
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吟罢，又手提羊毫，伏案疾书，给寻溪女校的女友徐双韵写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7月13日下午，杭州派来的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一面指挥一部分人在前门抗击，一面令另一部人从后门泅水突围。她从容地销毁了革命党人的名单和未转移的书信文件。秋瑾一手握六轮手枪，一手执剑，英勇顽强地搏斗。学生们在秋瑾的率领下，以校门、墙壁为掩护，猛烈阻击清军，当场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经过一场激战，清军撞开前门，一涌而进。秋瑾带领程毅等十几个人，在操场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格斗。终因敌寡悬殊，秋瑾、程毅等6人一起被捕。

绍兴府连夜密审，秋瑾临危不惧，刚强不屈，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咬紧牙关，决不叛变革命。最后，敌人要她在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上签字，她愤然提笔，先写了个“秋”，就停笔思索起来。她眼望着法庭门外连绵的凄风苦雨，牵挂着阴霾笼罩下的中华民族，思念着惨遭摧残的革命事业，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革命暂受挫折的悲愤。

面对钢打铁铸、威武不屈的英雄，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伪造供词，捏造罪证，强捺指印，草草定案。清政府惧怕光复军前来劫狱，下令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杀害秋瑾，这天翌晨，杭州派来的新军和绍兴府所有军警，全部出动，从知府衙门到绍兴城中的轩亭口的路上，行人断踪；全副武

装的军警手执火把，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轩亭口型场围得水泄不通。秋瑾身空白布衫、黑纱裤，被几个清兵押解着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她无限深情地举目四望，向祖国美丽的山河，向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同胞，向可爱的家乡鞠躬告别。临斩官汪瑞年问道：“女犯秋瑾，开斩之前，有何话要说？”秋瑾怒目而视，一声怒吼：“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不能夺我的志！”年仅29岁的巾帼英雄秋瑾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秋瑾壮烈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整个社会舆论对女侠深表同怀，沉痛哀悼，一致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暴虐无道。

浙江巡抚张曾祥和绍兴知府贵福，在浙江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于1907年冬夹着尾巴滚出了浙江省。各地的报刊都刊登了谴责清政府的文章；海外的留学生团体和革命组织也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清政府杀害女侠的罪行。浙江不少地区的光复军余部和会党，在一年间发动了大小数十起武装暴动，为秋瑾复仇。在上海的革命党人，也准备在上海发动起义。总之，秋瑾的殉难，教育了人民，激励了革命者的斗志，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

秋瑾生前曾与挚友徐自华订有死后埋“骨”西湖之约，徐自华在秋瑾盟姊吴芝瑛的资助下，1908年初，将秋瑾灵柩移葬于西湖边上的西泠桥下，吴芝瑛亲手写了墓碑，徐自华写了墓志铭，并印发亲友。秋瑾墓落成后，前往凭吊的人络绎不绝，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便下令拆毁了秋瑾墓。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统治，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秋瑾的遗骨才由她的生前好友迁回杭州，建筑了新墓，并建立了一个纪念亭，取名“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途经杭州时，曾亲临秋瑾墓，祭扫烈士英灵，题赠了“巾帼英雄”的匾额。

鲁迅先生在他的著名小说《药》中，塑造了一个革命者夏瑜的形象。作品中的夏瑜，就是隐喻现实生活中的秋瑾。他为这位女革命家讴歌，寄予深切的同情。

1939年3月，周恩来同志来绍兴发动抗日，亲笔给他当时在绍兴的表妹写了“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浙东儿女争光”的题词，号召妇女们学习秋瑾的革命精神，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创建民国的伟人——黄兴

提起辛亥革命，人们必然会想起黄兴，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中华国民的缔造者之一。当时人们把他和孙中山并称，号为孙黄。著名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是他亲自领导的，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他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有人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一第岂能酬我志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廛午，湖南善化县人。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清政府通缉，才改名为黄兴，字克强。黄兴幼年时的中国，自居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满清政府先是抵抗无方，继则妥协求和，终则投降卖国。割地、赔款、开埠、丧权……台湾、新疆、西藏、云南等地警报频传。“满天风雨满天愁，天涯何处是神州！”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的凌辱和欺压。人们寝食不

安，悲愤不已，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亲友们的满腹忧虑，乡亲们的血泪陈述，教师们的借题发挥，都浇灌在黄兴的幼小心田上。列强的野蛮侵略，清朝的腐败无能，促使爱国的思想种子在黄兴的心田中萌发。

1885年，黄兴11岁的时候，到了新冲子新喜山庄周翰林私塾寄读，这位教师不但通晓经史，而且关心时事。他讲课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责任感。这年夏天，法国侵略中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中国的西南大门又被打开了，并且列强第一次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力”。国家新的耻辱直接震动了黄兴幼小的心灵。课下，黄兴详细向老师询问清军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的经过。听了老师的讲述，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此后上课时，他更加用心听讲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在静静的课堂上，字字掷地有声，字字拨动着他的心弦。失去生母的黄兴，更加懂得母爱的宝贵，可是一旦国家灭亡，又有多少儿女失去母爱！国家国家，没有国，何以为家！怎样才算爱国，怎样才使国家强大，年幼的黄兴在苦苦地探求着。

19岁时，黄兴进了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他读书用功。作文敏捷，由于成绩优秀，每月得到的课奖足够自己日常零用，不需要家里负担，也没有什么私事烦扰，但国忧却老是萦绕在他的心头，而对个人的功名利禄在他脑海里已经淡薄了。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取仕作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阶梯，牵动着多少人的心！黄兴的父母也不例外，望子通过科举成龙的心更迫切。黄兴看到继母已老，父亲又多病，不愿伤老人的一片苦心。在父母的督促下，22岁的黄兴参加了县试。动身前夕，乡间亲友办了酒席为他饯行，预祝他金榜题名，他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个人的名利无所谓，应试仅仅是愿不愿伤父母之心而已。他在《别母应试感怀》诗中说：“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后来虽然中了秀才，但他根本无心于科举，显然黄兴已立下了救国之志，已经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

1898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如黄兴后来谈到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时说的那样：“眼见鞑虏政治腐败，纲纪不修，官可钱买，政以贿成；而一般狗官吏，又在虐民以逞，剥民刮地，舞弊营私，无恶不作；盗贼横行，饥饉交侵，民不聊生；对外交涉，着着失败，而那拉氏又竟发宁与朋友，不给家奴的谬说；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外人不以人类视我，益坚我革命的决心。”此时戊戌变法运动已达到高潮，给了黄兴以极大的思想震动。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人的牺牲，封建顽固派“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叫嚣，使黄兴十分愤慨，他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樊笼，政治倾向开始明朗化。他偷偷地购买了卢梭的《民约论》，购了他所能买到的所有西洋革命史，废寝忘食地阅读这些书籍，精心地研究和学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眼界大开，思想日见激进，力主根本改革，决心走反满革命的救国道路。

在两湖书院，黄兴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术、测量以及兵操等新学科。年轻的黄兴，生活在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的时代，促使他不以读书为满足、以科举为出路，他决心担起救国的重担，并为此而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有人回忆说，那时兵操是刚设立不久的新课，许多学生不重视，而黄兴训练时却非常吃苦，每个动作做到一丝不苟。当时的一些同伴，不理解个人功名就在眼前的黄兴，为什么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花费那么多“不必要”

的精力，黄兴在一首《笔铭》的短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原来，它决心当一个投笔从戎的大丈夫！

两湖学院毕业后，黄兴于1902年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临行前，黄兴恳切劝告为他饯行的同学：只有革命，才能救亡图存。

留学日本

1902年夏初，黄兴告别了亲友和故乡，赴日留学。6月到达东京，以官费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读书。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学校。他的专业是普遍教育，但黄兴怀着救国救民的大志，意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推翻清政府。为此，他在日本学习期间，非常重视学习军事。利用业余时间向日本退伍军官学战略战术，去神乐坂武术会练习打靶，掌握射击技术，或去参观士官联队的军事训练，增长才干。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

黄兴到日本仅仅4个月，由于他笃实厚重，乐于助人，很快得到同学们的拥护，他被弘文学院的学生举为中国留学生会馆的评议员，成为留学生中一位有号召力的活动分子。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黄兴始终没有剪掉辫子，也未尝大叫革命。他反复强调说：“救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只有在战场上挺身杀敌，或者杀身成仁，才真正有力量。”1902年12月，他和杨笃生、樊锥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这个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主独立。以后黄兴又和杨笃生、张孝准等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他还领导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组织“土曜会”，鼓励大家“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正在这时，影响深远的“拒俄运动”震动了留日学生界。

1900年，沙俄利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出兵占领整个东北。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撤，反而于4月18日提出7项无理要求，企图确保东北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4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披露了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的密约内容，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黄兴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并和蓝天蔚、钮永建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

由于黄兴懂得军事知识，每天清晨，就由他带领队员们秘密到大森练习射击，并教授枪法，风雨无阻、进行操练。这支义勇队似后改称学生军，不久又改称军国民教育会，确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继续进行救亡图强的活动。黄兴一直是这个激进的爱国团体的中坚分子。

黄兴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刚刚毕业，传来了清政府与俄国交涉失败、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于敌国和骨肉同胞受欺凌的消息，黄兴“焦急万分，咯血斗余”，经过10多天的治疗，才有好转。病愈之后，黄兴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到极点，今后唯有实行革命，才可挽救危亡于万一！”他认识到，只在国外宣传革命不行，还必须回国实行革命。于是他“自认”为运动员，主动要求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这样军国民教育会就决定，派他和弘文学院师范科湘籍学生陈天华回湖南等地发动起义。

黄兴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他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心眼实在的黄兴，不安于只在国外用口舌进行革命，决定回国组织革命团体，“以枪弹实行革命”，推翻腐朽政府，挽救民族命运。

创立革命组织

1903年夏，黄兴抵达武昌，应邀到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揭露清廷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阐述必须改革国体、政体的理由，同顽固派激烈辩论了整整一天，使在场的师生大为叹服。张之洞和书院院长梁鼎芬闻此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驱逐黄兴。后来黄兴回到了故乡长沙。

黄兴先后在明德、修业等学校任教，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种子。如教授地理课时，经常针对现实政治，在学生地图上题写诗词名句。当帝国主义列强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的时候，学生在我国地图上看到“今也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的诗句；当日俄两强为了独占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清政府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学生在东北地区的地图上看到“汉家烟尘在东北”的诗句；当清政府使祖国的山河破碎，人民啼饥号寒的时候，学生在祖国的地图上看到“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等诗句。这些诗句，无疑会大大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这时的黄兴已把辫子剪掉，表示他对革命忠心，使许多学生都倾心于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华兴会、同盟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30岁生日，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借祝寿为名，召开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麟等，会上决定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被推选为会长。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用办矿的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实际上在为革命筹经费。华兴会于190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会上研究了武装起义的事宜，决定首先在湖南发难，然后谋求各省响应，以达到“直捣幽燕”的目的，并决定以联络会党为要务，立即策动武装反清。会后又专门成立两个秘密外围组织“同仇会”和“黄兴会”。“同仇会”联络会党，“黄兴会”联络新军。他们还积极印刷宣传品，购买军械制造炸弹等，为起义作充分准备。为筹集起义经费，黄兴还出卖了在家乡的祖遗田产。

起义前黄兴为发展革命力量，不辞辛苦，四处奔波。曾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步行30里，说服了当时湖南“哥老会”的首领马福义联合起义闹革命。兴中会首领商定于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黄兴自任大将军兼会长。计划先攻占长沙，而后迅速向全省发展。不料出现了叛徒，起义泄密，黄兴被悬赏捉拿，起义未发动就流产了。黄兴几经曲折，历尽艰险，躲过敌人的搜捕，于1905年流亡日本。在日本他结识了革命领袖孙中山，一见如故，彼此都对革命的前途充满胜利信心。他对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各派力量，建立革命统一组织的主张，深表赞同。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上。

碧血黄花岗

从 1904 年到 1911 年，黄兴亲自领导了六、七次反清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著名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

为了做好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 年 1 月中旬，黄兴由南洋的槟榔屿来到香港，与赵声等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统筹部成立之后，积极购运军火，挑选人员，组成了有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参加的一支 800 人的敢死队，担任发难的主力。4 月 8 日，黄兴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发难会议”。23 日又由香港潜入广州，部署起义。在关键时刻，因内奸告密，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全城实行戒严，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危急关头革命党人没有畏缩。黄兴决定 27 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发动武装起义，改原来十路进攻为四路进攻计划。临战前，他向南洋革命党人发出绝命信：“本日当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以表示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4 月 27 日下午，广州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举世震惊的广州起义爆发了。以黄兴为首的一支由同盟会骨干 120 余人组成的主力敢死队，臂缠白布，手执枪械炸弹，在螺角号声中，猛攻总督衙门，“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向前。”战斗中，黄兴一马当先，革命军奋力拼杀，士气大振，很快攻入总督署后堂，这时总督张鸣岐早已从后门逃走，革命军放火烧了督署，又冲杀出来，刚刚出衙门，便与清军调来的大队人马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黄兴率领革命军英勇抗击，由于寡不敌众，许多同志中弹牺牲，黄兴右手扣枪机的两个指头也被打断，但他忍着巨烈的疼痛，继续进行抵抗。敌人已将他们包围，革命军便分三路突围。黄兴自带一队冲出南大门，且走且战，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换装出城。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朱执信“胸腿受伤，血透外衣”，但他仍从牺牲的战士中拣起枪支继续战斗；方声洞从督署衙门冲出后，孤身被围，容无惧色，犹挥弹突击，计杀哨弁兵勇等 20 余人。“背血叉，身中弹，血流遍体而气不衰，弹尽力竭而死”。不少革命党人受伤被俘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从容就义。广州起义失败了。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 72 具，合葬在城东黄花岗，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者的鲜血没有白流。经此一猛击，清廷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对清政府的灭亡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孙中山对这次起义评价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和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黄兴作为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勇敢无畏忘我牺牲的精神在国内外赢得崇高的声望。

搏击汉阳城

继黄花岗起义后仅仅半年时间，武昌又爆发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清政府闻讯后，急忙调集重兵，猛攻汉口，起义军处于万分危急关头。这时正在香港的黄兴得知消息后，立即启程返回上海，由上海乔装打扮躲过了沿江各口清军的严密稽查，于 1911 年 10 月 28 日安抵武昌。当晚黄兴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

前线将士听到黄兴的到来，个个士气高涨，军心大振，信心倍足。在黄兴的指挥下，革命军在汉口一举夺回被清军占领的许多阵地。清军不甘失败，

再次调来大批增援部队。由于力量悬殊，革命军只好撤出汉口，固守汉阳。

黄兴精心制定了作战方案，率部队挺进汉阳，把司令部设在昭忠祠。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他利用汉阳兵工厂的木材、铁板日夜赶筑工事。11月6日，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6个多小时的激战中，黄兴指挥革命军击退了清军5次进攻。清军无奈，便集中大炮疯狂轰击起义军阵地，一时弹如雨下，浓烟遮月。黄兴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加固工事，使部队避免了伤亡，并坚守了汉阳阵地。

11月中旬，湖南援军陆续到达，黄兴组织力量准备反攻汉口。16日分兵3路向汉口进攻。他率领司令部人员渡过琴断口浮桥，亲临前线指挥，由于清军占优势，黄兴统率的各路军缺乏训练，军纪松懈进退不一，再次退守汉阳。在战斗中黄兴冒着枪林弹雨，和革命军一起顽强战斗。清军的炮弹落在他的身边，随从强拽硬拉，方才躲避一下。尽管黄兴率部殊死奋战，但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下，27日汉阳终于失陷，黄兴只好退回武昌。

黄兴率革命军与敌人战斗一个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相持24天的汉阳保卫战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对于黄兴督师汉阳的功绩，冯自由曾作这样的评价：“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打击了清军，保卫了湖北军政府，并争取了时间，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等几个省宣布独立，江、浙革命军攻克了南京，清朝统治者呈土崩瓦解之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兴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当袁世凯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后，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第二次革命”，黄兴在南京任讨袁总司令，与孙中山一起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黄兴去日本和美国，在华侨中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宣传工作。1916年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电请黄兴回上海。不久，黄兴因长期奔波不定的革命生涯而积劳成疾，胃病复发，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黄兴的一生，是从爱国到救国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生。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照耀宇内，激励后人。

屡挫屡奋 矢志不渝——孙中山

在中国历史和20世纪世界史上，辛亥革命是一块雄伟的里程碑，这块里程碑上，镌刻着一个不朽的英名——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是勇敢地站出来向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挑战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艰难地奋斗了一生，他那矢志不渝的爱国业绩，一直为人们仰慕和传颂。

改良祖国 拯救国群

孙中山（1866~1925），幼名帝象，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因粤语谐音，改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1897年，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以后，人们便称他孙中山。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去澳门当鞋匠，后来回家务农，租种了几亩薄田，兼当本村更夫，以维持家计。他的哥哥孙眉在1871年去檀香山做工，后来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的幼年时代，家境贫困，蕃薯是全家的主要食粮。他6岁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跟姐姐上山打柴，下田除草，有时还伴随外祖父出海捕捞海豹。孙中山国家庭经济窘困，10岁才得以进私塾念书。贫苦的农家生活使他在少年时代就憎恶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他亲眼看到清王朝差吏催粮逼税，贪官污吏公开劫掠邻居园宅，地主富豪虐待奴婢……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习俗使他幼小的心灵萌发出了愤慨和不平，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国群之愿。”

翠亨村有位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战士冯爽观，经常给孩子们讲述洪秀全等人的革命故事。太平天国运动一系列惊心动魄、引人深思的英雄事迹更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兴趣。17岁那年，他勇敢地向神权挑战，捣毁了村庙北极殿的“北极帝君”、“金花夫人”泥像，劝告人们不靠神仙靠自己，结果为封建豪绅所不容，被迫离乡背井。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杨氏去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苍茫浩瀚的大海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些成果使他眼界大开。后来他曾回忆说：“始见轮舟之奇，苍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后，孙中山相继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的西式学校中念书，接受了14年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1885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更加暴露出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反动本质。孙中山从此决心学医，立下了“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倾覆清廷，创造民国”的大志。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在学医期间，孙中山十分勤奋。他不知疲倦地博览群书。除了学好医学理论外，他还研究了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他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还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一起畅谈国事，抨击时政，称颂太平天国革命，抒发爱国情怀。孙中山和陈、尤、杨被称为“四大寇”。他们互倾救国抱负，发表反清言论，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那时孙中山自命“洪秀全第二”，曾发起组织了“辅仁文社”，提出以“尽心爱国”作为座右铭，并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鼓励人们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斗争中去。

毕业后，孙中山曾先后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由于他医术精湛，不久，便誉满澳门、广州一带。他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不但常为穷人免费治病、赠药、送钱，而且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1893年春，广州《中西日报》刊登的一则奇特的行医广告，足以看出孙中山救世济贫的崇高精神，现将这则行医广告摘抄如下：

“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每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证，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此布。”

孙中山常与病人一起慷慨评论天下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开展了挽救危亡的革命活动。

1894年，孙中山受到当时国内盛行的改良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的上

层人物抱有幻想，认为通过“求知当道，游说公卿”，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年夏天，他从广州，经上海，去天津，希望会见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并且写了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要求改革弊政，“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建议李鸿章采纳和支持他当时的这一主张。却没想到李鸿章竟根本置之不理。孙中山遭此冷遇，情绪低沉地来到北京。他所看到的是甲午战争接连惨败的凄景和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从皇宫到颐和园沿途遍设的彩棚、戏台。山河破碎，国破民穷，亡国亡种的阴云笼罩在中国大地之上，而封建统治者还在寻欢作乐，粉饰太平。孙中山悲愤交织，感慨万端！他认识到“从此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毅然摒弃改良幻想，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险征程。

首倡革命 创立民国

1894年秋，孙中山告别了多灾多难的祖国，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北部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当时，那里侨居着渴望祖国的强盛的4万多爱国同胞。孙中山坚持在他们中间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

同年11月24日，檀香山卑涉银行寓所，20多位华侨在这里聚会，他们为甲午战败的国耻而切齿、悲愤。就是这次聚会，孙中山组织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救国革命团体——兴中会。会上，孙中山低沉地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宣言》。当他读到“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时，声调高昂，热血沸腾，与会者无不表示赞同，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接着大家庄严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个纲领的雏型。1895年1月，兴中会决定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利用秋祭扫墓的时机，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率陆浩东等人到香港、广州设立机关，主持起义事宜。孙中山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开了个“乾亨行”，作为武装起义的指挥机构。经过半年多的策划，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团结了数千人，购置了600余支手枪，联络了会党，商定兵分三路，炸毁两广总督府，夺占广州城。到了10月25日，香港方面派来的起义者因故不能按时到达，广州方面叛徒出卖了孙中山策划起义的秘密。侵占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与清政府沆瀣一气，密通情报。清政府伸出魔爪，到处搜查，还悬赏1000两花银缉拿孙中山。兴中会骨干陆浩东等人不幸被捕，英勇牺牲。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没有打响，情势十分危急，会友们催孙中山迅即逃离，他却说：“同志们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逃脱呢？”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容地疏散会员，销毁密件，被迫撤离广州，经香港，流亡日本。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流产了。

在日本神户港上岸时，孙中山买了一张日文报纸，只见一条醒目的新闻赫然入目：

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这条消息激起了孙中山澎湃的心潮。他感到称“革命”比他用“起事”“发难”等更能反映他所探索的“振兴中华”的道路，“革命党”的称呼比“会党”也更意义鲜明。他对随行的同志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

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此后，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一直奔波在日本、檀香山、英国等地。

清政府在国内抓不到孙中山，密令清政府驻亚、欧、美各洲公使派出密探，伺机缉拿归案。为了避人耳目，孙中山剪掉长辫子，换掉长衫，还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但断发改装，更名换姓，也没能躲过清政府鹰犬的追踪。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派人诱骗绑架，囚押在使馆，阴谋将他偷运回国杀害。幸亏他学医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积极营救，才得以脱险。通过举世瞩目的“伦敦蒙难”事件，孙中山在欧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蒙难后的一年里，孙中山继续留住伦敦，他经常去图书馆阅读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书籍。这期间他还目睹了英国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到英国政府残酷镇压的情景，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此后，孙中山风尘仆仆，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欧、亚、美洲各地，宣传“非革命不能救国”的道理。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无不为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鼓励；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把他比作“革命之辰”，不远万里去找他；盼望中华崛起的华侨，掀起募捐献款热，乃至不惜毁家纾难。

1897年秋，孙中山重返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京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孙中山慷慨疾呼：堂堂中国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不畏艰险地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积极活动，指令郑士良潜入广东，于10月8日在惠州揭竿起义。起义军旗开得胜，血战半月，发展到两万多人。但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给养不足，在清军重重包围下，起义军处境十分困难，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孙中山直接组织的惠州起义又告失败。

困难可似激发先驱者的智慧，挫折只会坚定革命家的决心。20世纪初，在兴中会的影响下，中国涌现出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中著名的有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这些爱国团体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相继来到日本。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体会到这些革命团体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很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当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到日本后，孙中山便立即热情地同他们会晤，诚恳地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提出“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建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一致赞同。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不到一年，参加同盟会的就超过1万人。孙中山还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里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从理论上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治思想，它推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同盟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有了中流砥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改良思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那些鼓吹忠君保皇、主张改良的保皇派展开了一场持续几年的大论战，揭露了保皇派的本来面目，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1905~1911年的五年里，接连领导、组织了10次反清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过程中，孙中山率领黄兴等人亲自到炮声隆隆的前线参加战斗。他激动地说：

“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轰击清军耳。”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的镇压。然而，反动派的血风腥雨扑不灭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正当孙中山在美国积极筹募革命经费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惊雷震响中原大地。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地奋起响应，摧枯拉朽，以共和代替帝制。不到两个月，当时全国24个省区中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余10省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王朝很快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

孙中山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的。报道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他多么渴望飞渡太平洋，回到祖国，亲自指挥对清王朝的最后一击。但他意识到，目前最要紧的，是进行樽俎之间的外交斗争，继绝清王朝的后援，而不是去疆场上冲锋陷阵。经过40多天紧张的外交活动，孙中山于1911年11月24日由法国乘船回国，12月21日到香港，12月25日回到上海。4天之后，17省代表开会，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乘专车从上海到达南京，在50年前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3个多月里，制订并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30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和措施。《临时约法》的革命性、民主性，对打击一切封建帝制的复辟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将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和在中国持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概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历史功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二次革命 百折不挠

“雄关漫道真如铁”，革命的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直处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地位极不巩固。革命党内部有一股所谓“咸与维新”、“新旧合作”的妥协潮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郑重保证，迫使孙中山于1912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他取而代之，轻易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声明说：“解职不是不理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事业。同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他立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为此，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正当孙中山再赴日本，考察铁路状况并筹措铁路贷款时，袁世凯策划的暗杀宋教仁的罪恶枪声，把孙中山从梦幻中惊醒，他从斗争实践中逐步看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和反动本质。孙中山沉痛地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那样。”知错改错，从头做起，孙中山断然主张武装讨袁。1913年3月27日，孙中山赶回上海，召集黄兴等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力排众议，认为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不能用法律解决，非用武力不可。会后，他冲破阻力，发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革命党人，兴师讨袁，并把这场反袁战争称之为“二次革命”。由于党内意见

不一，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军队的联合进攻下，“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归于失败。孙中山被通缉，再次流亡日本，重新组织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其中有几个自称会推算“八字”的人，他们想了解孙中山的出生年、月、日、时，以便卜测革命的命运何时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他们推选一个人去问孙中山，孙中山十分生气地说：“你们青年人怎么这样迷信？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想革命了？告诉他们，我的‘八字’就是一定要‘打倒军阀，继续革命’。”孙中山用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鼓励这些垂头丧气的人振作起来，继续奋斗。他还函告各地革命党人，鼓起勇气，勇往直前，并满怀信心地写道：“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为了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当选为总理。建党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讨袁上，仍保持着首倡革命时的那股劲。两年中，他先后又组织了十几次讨袁武装起义。孙中山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推动了全国波澜壮阔的讨袁浪潮。

1916年4月，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北洋军阀段祺瑞上台。当时的北洋军阀已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大派，各省、各地也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1917年，段祺瑞悍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他认为《临时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国之命脉”，必须同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做不懈的斗争。是年7月，孙中山联络并率领受革命影响而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西南军阀的应瑞、海琛两艘军舰，到了广州，开展“护法运动”。8月，在广州建立了同北方段祺瑞政府对峙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立即组织北伐，以图“树立真正的共和”。然而，南北军阀本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所依靠的西南军阀只不过是借“护法”扩大地盘，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护法”的旗帜踩在脚下，孙中山被军阀所排挤，不得不离开广州。持续不到一年的“护法运动”又告失败。1918年夏天，孙中山意气消沉地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设立了一个事务所。

辛亥革命已经7年了，帝国主义的军舰仍然游弋在黄浦江上，饥寒交迫的贫民照旧流浪在巷尾街头，外国军警依旧在“租界”横行，在军阀混战中的祖国山河仍然是支离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专制黑暗。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奋斗了30多年，结果“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推翻了一个暴君专制，却生出无数“强盗专制”，对国家、人民危害之烈，有甚于前者。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孙中山从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党人心不齐，各奉其旨，各行其事，从思想到组织都很涣散。在革命党人中，有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他们用这种理论众口烁金，讥讽孙中山，冷淡拒绝孙中山重建共和的主张，甚至用这种理论公开为他们的妥协、颓唐、背叛进行辩解。可见，要继续“振兴中华”的事业，加强革命党人的思想建设则是刻不容缓的。孙中山决定在事务所住下来，闭门著书立说，以统一革命党人的

思想，唤起民众觉悟。他辞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职务，声明在一段时间里，“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

从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中，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不是“知易行难”，恰恰是“知难行易”。他曾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与我为邻，亲与其邦，乃我之福”；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四十多天，他为联英、联美紧张奔波。然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给革命党的全是“援助”的空头支票，加上欺骗、讹诈和破坏。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有类似的过程。这些都说明求得真知的困难。为了通俗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 10 事为例来论述，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用以教育革命党人总结历史经验，“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指导“振兴中华”的革命斗争。接着孙中山又著成《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同他以前写成的《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合起来，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设想的建设中国的蓝图。在“实业计划”这部分，他提出了交通、商港、都市、水力、灌溉、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 10 万英里铁路、100 万英里公路和 3 个巨大海港，以及许多大工厂、大矿山……

随着《建国方略》的成书，孙中山对未来的宏伟蓝图越来越清晰、具体，但他对已没有生气的国民党能否实现这美好的远景，也越来越怀疑、迷惘、苦闷、彷徨了。

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

正当孙中山一筹莫展，子然无助的绝望时刻，1917 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给他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孙中山从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宣言中认识到：革命后的俄国，是“振兴中华”的真正同盟者。他设法同苏维埃政府联系，表达了“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列宁收到孙中山的电函后，委托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孙中山，表示在中国革命“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坚定地同中国兄弟站在一条战线上。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使孙中山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热烈支持学生和工人的英勇斗争，找到了“振兴中华”的依靠力量。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促成两者的合作。7 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了。是年年底，在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下，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同孙中山亲切会谈了 9 天，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十分赞同。经过反复酝酿，孙中山确定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方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2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多次同孙中山交谈，具体讨论了通过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和两党合作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后来，孙中山曾经发自肺腑地告诉夫人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几天后，由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等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24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纲领。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也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的飞跃。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军官学校，周恩来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派到黄埔军校工作。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深深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国共第一次合作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当是，祖国北方军阀混战，灾难深重。孙中山决心北伐。1924年秋，他在广东韶关举行北伐誓师，指令北伐各军分两路进军湖南和江西。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了北洋军阀曹琨、吴佩孚，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明知去北京有遭军阀暗算的危险，且身体已积劳成疾。但为了祖国的统一，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北上，并在1924年11月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孙中山安排好各种工作，便和宋庆龄乘船离开广东。他沿途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当孙中山路过天津时，张作霖、段祺瑞的代表借口前来看望，趁机劝说孙中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愤怒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中山抵达北京，受到10万市民欢迎，李大钊亲往迎接。这时，孙中山病情严重，医生确诊为肝癌晚期，段祺瑞对病危的孙中山并不放过，不但不召开国民会议，却坚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强调不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坚决予以抵制，严正要求段祺瑞“改弦更张”。这是孙中山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

孙中山的病情日益恶化。他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对后人予以殷切希望。1925年3月12日凌晨3时，孙中山先生不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在他临终前，还竭尽最后一点精力，用极微弱的声音继续地反复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革命的先驱，他生前虽未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但是，他为后人设计了“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他那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

